

# WORLD AGRICULTURE

(Monthly, Started in 1979)

No.06, 2020

## Main Contents

- A general framework of global agricultural market  
..... HU Bingchuan (18)
- Sustainable food consumption behaviors; Incentive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 QUAN Shiwen (25)
- The Quality Audit Service of European Union's plant variety DUS examination offices and its use for reference  
..... DENG Chao, YANG Xiongnian (36)
- An analysis of American limited cooperative system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 QIN Yu, Dong Xiaoyu (42)
- Operational models and experience of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ZHU Yanjing, FENG Lin (51)
-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of food FOP labeling system based on literatures from WOS database  
..... HUANG Zeying (80)
-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xperience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enterprise and its reference to China  
..... ZHOU Jie (87)
-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public welfare projects: A case study of The World Food Prize  
..... ZHANG Song (92)
- The enlightenment of Danish pig industry construction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ig industry  
..... CUI Haihong (98)
- Exploration on 70 years' history of China's agriculture "Going Global"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 HAN Zhenguo, YANG Jing, LI Jing (104)

Edited by World Agriculture Editorial Office

E-mail: shijienongye2008@126.com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No.82-130

Published by China Agricultural Press Co., Ltd.

Address: No.18 Building Maizidian Street,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125

Editor in Chief: Hu Leming

Vice-Editors in Chief: Zhang Lisi Xu Hui

Executive Chief Editor: Jia Bin

Editors: Zhang Xuejiao Du Jing Wei Jinjin

Tel: 010-59194435/988/990

Fax: 010-65005665

Website: <http://www.ccap.com.cn>

##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屈冬玉

副主任

隋鹏飞 陈邦勋 谢建民

杨易 张陆彪 倪洪兴

童玉娥 夏敬源 朱信凯

委员 (按姓名笔画排序)

丁声俊 才学鹏 万建民

马有祥 王广斌 王钊

王林萍 孔祥智 邓秀新

左常升 平瑛 叶兴庆

冯东昕 匡远配 朱明

朱晶 刘天金 刘汉武

刘国道 刘艳 严端祥

杜志雄 李树超 李翠霞

杨万江 杨振海 杨敏丽

何秀荣 宋昱 宋洪远

张广胜 张弘 张兴旺

张安录 张林秀 张显良

张海森 张越杰 陈昭玖

陈剑平 陈萍 陈盛伟

罗必良 周应恒 屈四喜

赵帮宏 赵鸭桥 胡乐鸣

姜长云 贺军伟 聂凤英

聂新鹏 栾敬东 高强

郭沛 唐忠 黄伟忠

黄延信 崔利锋 彭剑良

韩沛新 程国强 程金根

蒲春玲 雷刘功 樊胜根

潘文博 潘利兵 霍学喜

## 目次

### 热点聚焦

贸易摩擦下中国对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分析及启示 ..... 贺蕾 (4)

乡村内生发展视角下资源的内涵及其应用 ..... 袁宇阳 张文明 (10)

### 专题综述

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一般性解释框架 ..... 胡冰川 (18)

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动力机制与引导策略 ..... 全世文 (25)

欧盟植物品种 DUS 测试机构质量评审及其借鉴 ..... 邓超 杨雄年 (36)

### 政策研究

美国有限合作社制度探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 秦愚 董晓宇 (42)

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性担保运作模式及经验借鉴 ..... 朱艳静 冯林 (51)

### 分析预测

西部地区农业碳排放的时空演变及 EKC 假说检验

——基于西部大开发 12 省份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 ..... 廖卫东 刘森 (62)

生猪养殖补贴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苏省生猪养殖户的分析 ..... 王善高 田旭 雷昊等 (71)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  
**协办单位**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农业行业分会)  
 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

### 环球瞭望

基于 WOS 文献的食品 FOP 标签系统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 黄泽颖 (80)  
 .....  
 美国农业企业化发展进程、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 ..... 周 婕 (87)  
 非营利组织公益项目运行机制研究  
 ——以世界粮食奖为例 ..... 张 松 (92)  
 丹麦养猪业生态建设对中国养猪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  
 ..... 崔海红 (98)

### 中国农业

新中国 70 年农业“走出去”的历程探究 .....  
 ..... 韩振国 杨 静 李 晶 (104)  
 基于扎根理论的乡村旅游可持续生计分析  
 ——以南京高淳大山村为例 ..... 全千红 沈苏彦 (110)

### 国际粮农动态

国际农发基金举办“处于前线的农民”主体论坛等 7 则 ..... (120)

### 贸易监测

2020 年 1~4 月中国农产品贸易监测 ..... 李蔚青 (124)  
 2020 年 6 月世界农产品供需形势预测简报 ..... 梁 勇 (127)

### 英文摘要

MAIN CONTENTS ..... (132)

**主 编** 胡乐鸣  
**副 主 编** 张丽四 徐 晖  
**执行主编** 贾 彬  
**责任编辑** 张雪娇 杜 婧  
 卫晋津  
**编 辑** 吴洪钟 张雯婷  
 汪子涵 陈 璿  
 程 燕

**出版单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 中农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 782 信箱)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出版日期** 2020 年 6 月 10 日  
**邮 编 地 址** 100125 北京朝阳区麦子  
 店街 18 号楼  
**电 话** (010)59194435/988/990  
**传 真** (010)65005665  
**投 稿 邮 箱** shijienongye2008@126.com  
**网 址** <http://www.ccap.com.cn>

广告发布登记：  
 京朝工商广登字 20190016 号  
**ISSN** 1002 - 4433  
**CN** 11-1097/S  
**定 价** 18.00 元

凡是同意被我刊发表的文章，视为作者  
 同意将其文章的复制权、发行权、汇编  
 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给第三方。  
 特此声明

本刊所登作品受版权保护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 ● 热点聚焦

# 贸易摩擦下中国对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分析及启示

◆ 贺 蕾

(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21)

**摘要:** 在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引致的“价差驱动型”进口动力不断增强, 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 中国对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对于保护国内农业发展, 维护企业和农民利益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2月, 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高粱发起反倾销调查。本文就此次反倾销调查的背景、经济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研究发现: 从统计结果来看此次反倾销调查对进口美国高粱产生的贸易抑制作用和调查效应显著, 而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 此次反倾销调查中存在主体缺位、反倾销条例具体法规不明确、正常价值确定依据和方法存在偏差、临时反倾销措施对国内产业影响严重等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进口美国高粱; 反倾销调查; 进口抑制效果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0.06.001

## 1 引言

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 关税、配额等传统贸易限制措施在多边、双边贸易规则中被不同程度地限制使用, 而WTO协定中的贸易救济措施被各成员方多次使用, 其中“两反一保”中的反倾销反补贴已经成为成员方使用最频繁、范围最广的贸易救济措施。WTO反倾销通报的数据显示: 1995—2018年, 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5 725起, 而以中国为指控对象国的调查就有1 327起, 占23.18%, 其中美国针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提出的反倾销调查就有165起。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被反倾销指控最多的成员方, 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的贸易竞争力和企业利益, 这一事实致使国内学者对于反倾销的

研究更加侧重于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以及如何应对反倾销调查的策略方面<sup>[1-3]</sup>。然而, 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过程中, 贸易救济体系应包括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

收稿日期: 2019-12-25。

基金项目: 陕西省科技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陕西地理标志农产品质量维护激励策略研究”(2019KRM074), 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科学研究计划“农户维护地理标志农产品质量的契约激励策略研究”(19JZ0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价值农产品进口需求趋势、市场冲击与贸易政策规制研究”(71573211)。

作者简介: 贺蕾(1983—), 陕西绥德人, 博士, 研究方向: 农产品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WTO规则与协定, E-mail: helei@sust.edu.cn。

资料来源: WTO, Statistics on antidumping: Anti-dumping initiations: reporting member vs exporter,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



查和对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sup>[4]</sup>。中国对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对于保护国内产业,维护企业利益,促进国内与国际贸易规则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2001年,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为进一步开放市场下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合法地自我保护提供了重要武器。截至2018年,中国共发起反倾销调查274起,绝对数量远不及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sup>①</sup>,但是中国反倾销调查的立案数量已经进入了稳步增长阶段,围绕反倾销调查的行政体制、信息收集、问卷调查、成本核算、反倾销措施的运用等方面都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但是,中国针对农产品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的立案数量非常少。截至2018年,针对农产品的对外反倾销调查仅有9起<sup>②</sup>,相比化工等产品,农产品对外反倾销调查数量少之又少。然而,随着中国农产品国内外价差倒挂严重,为了维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合理的生产利润,基于成本之上的政策性收购价格不断上升,农业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涨,推动国内农产品市场均衡价格的持续上升,成本上升引致的“价差驱动型”进口动力将显著增强。另外,非必需农产品进口难以控制,如果综合考虑产品的硬缺口、品种调剂和产品之间的替代性,中国一半以上的粮食进口属于“非必需进口”<sup>[1]</sup>。主要农产品进口快速增加,对国内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挤压<sup>[5]</sup>。如何在兼顾国内农业发展与保持农产品供应稳定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农产品实施进口限制措施将是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由于中国加入WTO时所做承诺中农产品进口限制措施十分有限,关税、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的“安全网”作用难以发挥,而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救济措施对农产品进口的限制作用将更为明显。总而言之,中国有必要对国外农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救济措施,以保护中国农业产业安全<sup>[6]</sup>。

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多边贸易体系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受到严重挑战的当下,2018年2月4日,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高粱(以下简称美国高粱)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此次反倾销调查发起于

中美贸易摩擦初期,是对美国实施“232措施”的有力回击,更是对国内高粱产业的保护。本文主要剖析此次反倾销调查的背景、实施的经济效果、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及启示,研究结论对完善中国农产品反倾销调查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现实参考意义。

## 2 中美高粱生产及贸易状况

高粱是全球第五大主要粮食作物,是中国重要的畜禽饲料和酿酒原料。中国高粱年产量在280万t左右。2012年以前,中国高粱进口量不超过9万t,之后,高粱进口量快速增长,并于2014年开始成为世界第一大高粱进口国,进口量和进口金额均占世界总量的70%以上。2015年,中国高粱进口总量达到峰值,约1070万t,进口金额达到29.71亿美元,主要进口饲用高粱。高粱进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受近些年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影响,国内玉米价格显著高于进口高粱价格,且玉米进口有配额限制,而高粱进口无配额限制,因此,国内的饲料加工商选择用进口高粱、大麦、玉米酒糟等来替代玉米。

从进口主要来源地来看,中国主要进口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粱。近些年,进口美国高粱的比例快速上升,中国进口美国高粱的数量占高粱进口总量的比例从2013年的29.41%上升到2018年的94%,而进口澳大利亚高粱除2015年达到160万t,其余年份进口量均不超过80万t,但是澳大利亚高粱的市场占有率却锐减,从2012年的99.94%下降到2018年的11.75%(图1)。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中国是澳大利亚农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进口澳大利亚高粱的关税也将由2%降至零关税。随着关税的归零和两国贸易的自由化,预计后期进口澳大利亚高粱或有持续增长的可能。

① 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的绝对数量尚不及印度(919起),巴西(417起)、阿根廷(368起)等发展中国家,更不及欧盟(510起)、美国(694起)等发达国家或地区。

② 近期主要包括2018年对原产于美国的高粱反倾销调查,大麦反倾销调查;2017年对原产于巴西的白羽肉鸡产品反倾销调查;2016年干玉米酒糟反倾销调查,欧盟马铃薯淀粉反倾销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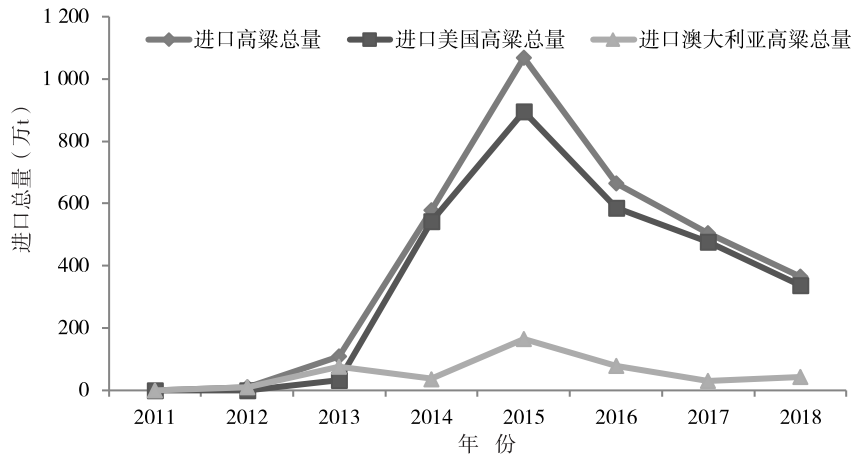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高粱进口总量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 2011—2017年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Database; 2018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查询平台 <http://43.248.49.97/>。

### 3 中国对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的始末

#### 3.1 反倾销调查立案

2018年2月4日,商务部公布了对美国高粱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的公告<sup>①</sup>。公告中表明从商务部获得的初步证据和信息显示:美国高粱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中国出口,存在较大幅度的倾销,对国内高粱产业和高粱价格造成削减和抑制,国内高粱产业遭受了实质损害和实质损害威胁,且倾销与国内高粱产业实质损害和实质损害威胁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商务部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八条<sup>②</sup>对美国高粱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 3.2 原审初裁

2018年4月17日,商务部公布了此次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公告。裁定认为美国高粱存在倾销,国内高粱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决定采取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即从4月18日起,中国高粱进口商在进口被调查公司<sup>③</sup>的美国高粱时,应向海关提供比率为178.6%<sup>④</sup>的进口保证金。

#### 3.3 终止调查

2018年5月18日,商务部公布了终止对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的公告<sup>⑤</sup>。终止的理由是大量下游用户反映此次反倾销调查将会提高下游养殖业成本,加征进口保证金会影响广大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不符合公共利益。因此,决定终止此次反倾销调查。另外,已征收的反倾销进口保证金如数退还。至此,

中国对美国高粱的反倾销调查尘埃落定。

### 4 对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的经济效果

中国对美国高粱的反倾销调查从立案到终止的时间较短,那么,此次反倾销调查对中国进口高粱是否产生抑制作用?根据反倾销调查的经济效果评价的经验显示,反倾销调查的进口抑制作用主要表现为:<sup>①</sup>贸易限制效应,即反倾销调查限制了对指控对象国相关产品的进口。<sup>②</sup>调查效应,即使反倾销调查结果未做出任何征税型的反倾销措施,反倾销调查本身仍会对指控对象国的相关产品起到进口限制作用。<sup>③</sup>贸易转移效应,即进口国增加了对非指控对象国的相关

<sup>①</sup> 参见《商务部公告2018年第12号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的公告》, <http://cacs.mofcom.gov.cn/cacscms/article/jkdc?articleId=152552&-type=1>。

<sup>②</sup> 《反倾销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在特殊情形下,商务部没有收到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但有充分证据认为存在倾销和损害以及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可以决定立案调查。

<sup>③</sup> 包括德怀特及亚当鲍德温农场、拉里达尔斯特、中堪萨斯合作社、得克萨斯奥德姆种植者谷物合作社、李惠特克、绿金农场等18家美国的主要高粱贸易公司和其他一些美国公司,但保证金率都是178.6%。保证金以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从价计征,计算公式为:保证金金额=(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保证金征收比率)×(1+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

<sup>④</sup> 参见《商务部公告2018年第38号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的公告》,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804/20180402733178.shtml>。

<sup>⑤</sup> 参见《商务部公告2018年第44号关于终止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公告》, <http://cacs.mofcom.gov.cn/cacscms/articleDetail/jkdc?articleId=154310&-id=53d8a6e2636b9faa01637126a90502d4>。

产品进口以替代指控对象国的产品<sup>[4,7]</sup>。

中国对美国高粱的反倾销调查是否抑制了对美国高粱的进口？反倾销调查前中国进口高粱量虽波动明显，但总体维持在 15 万~73 万 t（进口量小的月份保持在 15 万 t 以上，而进口量大的月份达到 73 万 t）。而 2018 年 2 月 4 日，商务部对美国高粱进行反倾销调查之后，3 月和 4 月对美国高粱进口有大幅上涨，比 2 月分别上涨 2.77% 和 14.9%。从 2018 年 4 月 18 日起，进口美国高粱加征 178.6% 进口保证金之后，从 5 月开始，中国对美国高粱进口量出现锐减趋势，从 2018 年 4 月的 63.85 万 t，降至 2019 年 3 月的 1 029t，下降幅度达到 99.8%，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6 月，进口美国高粱数量不足 1 万 t，从数据统计的结果来看，中国对美国高粱的反倾销调查的贸易限制效应显著。尽管 2018 年 5 月 18 日商务部终止了对美国高粱的反倾销调查，但是调查效应明显，对美国高粱的进口限制作用一直延续到 2019 年 6 月。2019 年 7 月，进口美国高粱总量

出现上升趋势，达到 20.97 万 t，根据中国高粱进口趋势可以预测，对美国高粱的进口会快速增长至调查之前的水平。

从贸易转移效应来看，在对美国高粱实施反倾销调查期间，对澳大利亚高粱的进口有小幅增长，进口量从 2018 年 4 月的 1.7 万 t 增至 7 月的 11.9 万 t，而后逐月下降至调查前水平（图 2）。反倾销调查立案后，对澳大利亚高粱进口的小幅增长只保持了 3 个月，贸易转移效应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有 3 点：一是美国高粱价格更便宜，2018 年，进口美国高粱平均价格为每千克 0.234 美元，进口澳大利亚高粱的平均价格为每千克 0.302 美元。二是相较于澳大利亚高粱，美国高粱单宁含量低（美国高粱单宁含量 ≤ 0.3%，澳大利亚高粱单宁含量 ≤ 0.7%），更适合用于生产饲料<sup>①</sup>；而澳大利亚高粱单宁含量高<sup>②</sup>，更适合作为酿酒原料。三是其他的高粱主产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印度等国），高粱种植更多用以本国消费，很少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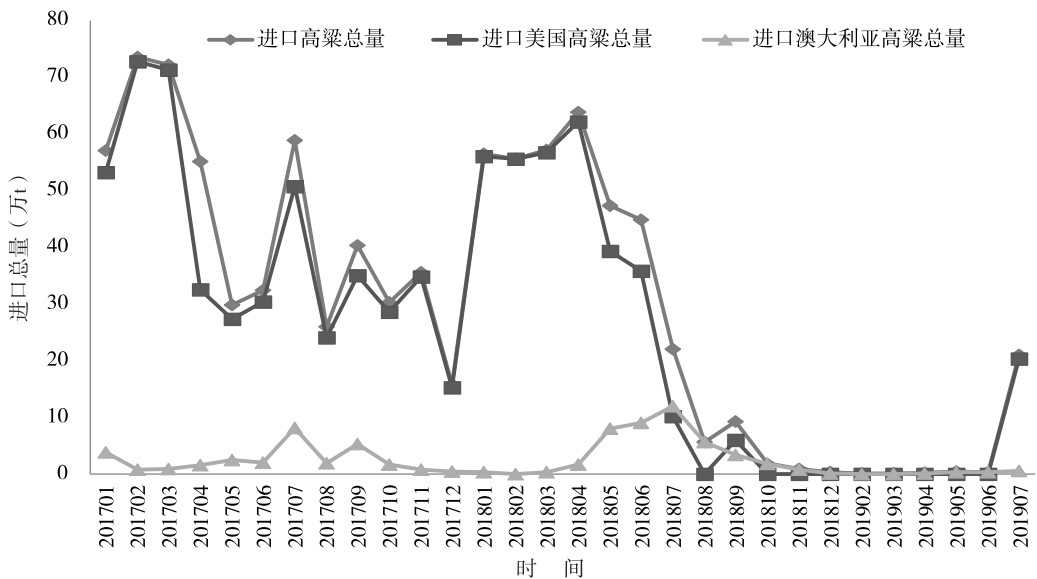


图 2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中国进口高粱总量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查询平台 <http://43.248.49.97/>。

## 5 中国对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暴露出的问题

### 5.1 反倾销调查中主体缺位

根据 WTO 相关规则，在两种情形下可发起反倾销调查，一是由相关产业申请发起调查；二是由调查机关依职权自主发起调查。《反倾销条例》中对于反倾销的主体<sup>③</sup>、申请程序以及相关环节均做出明

确的规定。

①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饲用高粱生产国，由于通过压碎、蒸汽、碾磨等技术处理，进一步提高饲用价值，普遍用于畜禽饲料。

② 适量的单宁对发酵过程中的有害微生物有一定抑制作用，能提高出酒率，单宁产生的丁香酸和丁香醛等香味物质，能够增加白酒的芳香风味，是白酒酿造的主要原料。

③ 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商务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

依照此条例,中国有资格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的主体主要是农业产业或能够代表农业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农业组织,是具有一定“产业地位”的主体。而中国农产品生产主体以单个农户为主,在申请反倾销调查时缺乏“代表农业产业”的主体地位,加上农户数量分散、反倾销意识薄弱等原因,决定了农户难以成为反倾销的申请主体。然而,具有主体地位的农业行业组织发展滞后,农业行业组织主要是在政府引导下,以农户自愿参加形成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这类组织在组织结构、运行和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农业行业组织规模较小,存在严重的区域分割、产业分割,分散的、规模较小的农业行业组织的市场力量薄弱,很难具有话语权;另一方面,农业行业组织运行和治理结构松散,缺乏专业的行业管理人员,对内管理和对外维护行业利益的力量有限,形成中国农产品反倾销调查主体缺位的局面。

## 5.2 《反倾销条例》中具体条款不明确

2018年4月17日,商务部公布的初裁结论认为美国高粱存在倾销,国内高粱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反倾销条例》规定初裁决定中确定倾销、损害以及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商务部应当继续调查,作出终裁,并予以公告<sup>①</sup>。

此次反倾销调查中,商务部初裁认定美国高粱存在倾销,但商务部并未公布初裁后对倾销及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的结果。虽然中国《反倾销条例》中对反倾销调查应当终止的情形有规定,如第二十七条规定:商务部认为不适宜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但是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是不适宜继续进行调查的;没有明确说明不适宜继续调查情况下,是否应该公布已有的调查情况;也没有明确说明如果初裁结论存在倾销,继续调查中出现终止调查情形,终止调查是否就意味着不需要作出终裁。由此可以看出,《反倾销条例》中很多具体条例仍存在不明确,法律解释弹性大,甚至条例间存在冲突等问题,从条例的统一性和对现实案例处理的法律权威性角度来看,仍然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

## 5.3 正常价值核算依据和方法存在偏差

在调查美国高粱生产成本环节时,调查机关向

登记为对中国出口高粱的农场<sup>②</sup>发放成本问卷,在规定的时间内,农场未向调查机关提交单独的答卷(虽然调查机关尽最大努力向所有已知利害关系方提醒了不配合调查的后果),由于农场未填报答卷,调查机关无法获知被调查产品及同类产品的销售和成本数据。另外,多数出口商提交的答卷信息不完整,如阿奇尔丹尼斯米德兰公司(ADM)等5家公司均未提交生产商和农场部分的调查问卷,公司仅提交贸易商部分的销售数据,建发(美国)有限公司未提供交易数据等。再者对中国出口高粱时,销售渠道中包括:先销售给新加坡的关联公司,再由新加坡的关联公司向上海关联公司和非关联客户销售被调查产品。调查机关发现,公司在答卷中未提交新加坡关联公司和上海关联公司的答卷。因此,调查机关认为公司填报的数据不符合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的要求。

在此情形下,调查机关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和资源经济系农业议题中心在其网站上发布的农产品成本研究报告和公布的《2016年谷物高粱成本示例》(2016 *Sample Costs to Produce Grain Sorghum*)报告作为生产成本的核算依据。在初裁中,调查机关暂认定该报告为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并以该报告中的数据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基础,调查机关依据该报告中的每英亩<sup>③</sup>成本和单位产量计算每吨的成本。但商务部公布的文件中倾销调查期为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而正常价值计算所依据的数据是调查期之前的,这种无奈的选择致使成本核算可能存在偏差。

再者,商务部公布的证据信息文件中对调整后的出口价格的计算方法是:用倾销调查期内美国高粱对中国出口离岸价格每吨181.11美元减去高粱的平均内陆运费每吨10.63美元,得出调整后的出口价格为每吨170.48美元,这种计算方法并未将进出

① 《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初裁决定确定倾销、损害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的,商务部应当对倾销及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终裁,予以公告。

② 包括德怀特及亚当鲍德温农场、J&C 合营农场、拉里达尔斯特腾、中堪萨斯合作社、得克萨斯奥德姆种植者谷物合作社、李惠特克、绿金农场、肯特马丁、迈克尔 T 贝克通过谷物协会向调查机关登记为对中国出口的生产商。

③ 1 英亩=0.405hm<sup>2</sup>



口海关税费、运输保险费和运输折损等成本考虑在内,对调整后的出口价格的计算方法不合理。另外,对正常价值的计算不严谨,存在价值重复计算的问题。商务部计算美国高粱正常价值采用的是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及利润的方式,实际计算中用美国高粱的生产成本每吨 190.13 美元加上根据其利润率 17.6% 计算得出的 33.46 美元利润,得到调整后的正常价值为每吨 223.59 美元,但是由于《2016 年谷物高粱成本示例》报告的高粱生产成本中,已经包含了农场的一般费用以及盈利情况,那么生产成本中包含的利润与按照生产成本 17.6% 的利润率计算的成本之间存在交叉,利润可能存在重复计算。

#### 5.4 反倾销措施采取进口临时保证金是把“双刃剑”

2018 年 4 月 17 日,商务部公布了相应的临时反倾销措施,即自 2018 年 4 月 18 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向中国海关提供进口保证金。这种对内征收高额保证金的临时反倾销措施虽然能够及时且有效地抑制进口商对美国高粱的进口,但这种措施带来的成本增加效应短期内难以反馈到出口商身上,反而需要中国的进口商来面对这种进口成本增加的冲击。另外,进口商对美国高粱进口的依赖,导致进口商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来消化这部分增加的成本,这势必会影响国内的消费者福利。2018 年 5 月 18 日商务部以不符合公共利益为由终止了此次反倾销调查也说明了此问题,由此看来,在采取进口保证金、保函或者其他形式担保的临时反倾销措施时,其措施的经济效果评价尤为重要。

## 6 中国对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的启示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对美国高粱的反倾销调查表明了中国农产品贸易中能够合理运用国际规则来保护中国的合法权益;也更进一步促进了国内与国际贸易规则的融合,从立案通知、信息公开以及对相关利害关系方的消息通知、意见征求等方面都遵循 WTO 规则,立案证据和初裁报告也符合 WTO《反倾销协定》中的相关条款,标志着中国在农产品方面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但仍存在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 6.1 明确市场利益主体,建立农产品贸易救济基金逐步培育和壮大农业市场利益组织,整合现有

农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社等行业组织,打破行业组织区域分割、产品分割导致的规模小、市场势力弱的现状,形成影响全国的行业协会,形成宏观层面的行业协会影响力,并进一步明确行业协会的市场利益主体地位,明确行业协会有责任和义务发起反倾销调查的申请。第一,行业协会要密切关注进口农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变动趋势,对可能存在的倾销倾向,进口企业协助行业协会迅速做出判断,代表行业利益成为反倾销申诉的主体,由行业协会统一聘请律师,统一诉讼。第二,行业协会可以成立反倾销基金,为反倾销申诉提供资金保障,尽可能减少企业搭便车的现象。第三,需要行业协会为企业提供技术培训与咨询服务,了解国内外市场动向和反倾销案例,特别注重培训企业收集产业损害预警数据,采集进口产品的倾销证据等。行业协会可以做好反倾销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向商务部申诉前要注意收集遭受损害的证据,保留近些年的产品价格、销量、净利润等重要数据,来应对反倾销调查。行业协会还可以加强对内部专业法律人士的培养,提高他们的反倾销业务能力,确保有能力做好反倾销申诉工作。

### 6.2 完善和补充《反倾销条例》的具体法律条规,对调查对象国的出口商行为进行约束

逐渐完善和补充《反倾销条例》中的法律法规,充分考虑农业产业特性,农产品贸易的特殊性,弥补现有法规中的不足之处,明确现有法规中需要详细说明的地方,明确各条法规之间的关系。结合农产品反倾销中的具体环节和具体问题,对反倾销条例进行完善和补充,使其能够更加具有针对性,如对农产品反倾销中的价格调整、价值计算、损害认定和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的核算、认定方法做出具体的说明,可以参考欧美国家和 WTO 反倾销法系中相关说明进行完善和补充。另外,反倾销条例中需对调查对象国的出口商行为进行约束,明确确立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并明确规定发生交易的双方均有义务配合调查机关提供相应的调查资料,以及如果调查对象国出口商不予以配合调查时相应的处罚。总之,要不断促进中国的反倾销法律法规与国际接轨,在对外进行反倾销调查时更具说服力、公信力和法效性。同时需加强普及反倾销法律知识

(下转第 50 页)

# 乡村内生发展视角下资源的内涵及其应用

◆ 袁宇阳 张文明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如何优化乡村资源配置, 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实现乡村振兴, 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从内生发展视角看, 乡村资源包括外生性资源和内生性资源两种基本类型, 内生性资源以显性和隐性两种基本形式存在。乡村内生发展的关键是有有效配置与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 尊重地方本土性, 着力挖掘地方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隐性的内生性资源。研究表明, 只有积极培育农民自主性, 真正赋权给地方, 科学制定乡村内生发展规划, 统筹利用好内生性资源与外生性资源, 才能激活中国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推动乡村振兴。

**关键词:** 乡村内生发展; 资源; 内生性资源; 外生性资源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0.06.002

## 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 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乡村建设有序推进,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乡村地区, 仍然过度依赖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扶持, 忽视了地方的本土利益诉求和内部发展潜力, 面临着发展模式单一、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困境, 严重阻碍了乡村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推进乡村振兴, 自2016年以来, 历年中央1号文件都明确提出, 要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同样强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要遵循“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强农业农村自我发展动力”等基本原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探讨如何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实现乡村内生发展, 已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

要课题。

近年来, 中国很多学者对乡村内生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这其中包括介绍内生发展的相关理论和概念<sup>[1]</sup>, 借鉴国外乡村内生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sup>[2]</sup>, 村庄内生发展水平量化操作尝试<sup>[3]</sup>, 中国乡村内生发展实践的案例分析<sup>[4]</sup>, 推动中国乡村内生发展的对策研究<sup>[5]</sup>等, 推进了学术界对内生发展的认识和理解, 为进一步深化乡村内生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乡村内生发展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 往往停留在比较宏观的叙述和抽象的表达上, 对很多重要问题如内生发展诸要素

收稿日期: 2020-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的内生发展论研究”(18VSI020)。

作者简介: 袁宇阳(1993—),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学, E-mail: ecnuyy@163.com; 张文明(1970—),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学。

之间的逻辑关系等研究不够,概念的本土化分析和命题建构不足,关于乡村内生发展的认知大多停留于浅表层次,也缺乏对国外乡村内生发展成功案例的深刻分析,难以探索出操作性较强、能切实有效推动中国乡村内生发展的本土路径。

笔者认为,要克服上述不足,深入讨论乡村内生发展问题,建构具有本土价值的中国特色乡村内生发展理论,必须以乡村资源为切入点,从内生发展视角认识和理解资源的内涵及其应用,探讨乡村资源与乡村内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一,资源是内生发展的前置条件和逻辑起点。研究表明,资源是内生发展的3个核心要素之一<sup>[1]</sup>,在参与、设计和实施发展行动的过程中,以本土资源为基础,可以使地方发展更加成功且可持续<sup>[6]</sup>。目前国外文献中关于内生发展的研究尤其强调资源的重要意义,认为合理配置资源是实现内生发展的前提和关键<sup>[7]</sup>。其二,从内生发展视角研究资源问题,有利于深刻把握资源的内涵,科学划分资源类型,进一步丰富资源相关理论,拓宽资源问题研究视野。其三,从实践层面看,中国不少乡村地区,对资源及其应用缺乏足够的科学认知,在推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过度依赖外部资源,面临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类实践问题,学术界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将从乡村内生发展的视角出发,尝试重新认识和理解资源的科学内涵,探讨资源和乡村内生发展的逻辑关系,并分析与总结国外乡村内生发展较为典型的案例,从中凝练出关于资源应用的经验和规则,在此基础上,讨论推进中国乡村内生发展的基本路径。

## 2 乡村内生发展视角下资源的内涵

从经济学视角看,资源指的是可开发利用、产生价值的事物<sup>[8]</sup>。从社会学视角看,资源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sup>[9]</sup>。内生发展视角下资源的概念,融合了各学科尤其是社会学对于资源的定义,内涵深刻,内容比较丰富,具体可以划分为内生性资源(endogenous resource)和外生性资源(exogenous resource)两种类型<sup>[10]</sup>,也可以称之为内部资源(internal resource)和外部资源(external resource)<sup>[11]</sup>。内生性资源以显性和隐性(tangible and intangible)两种基本形式存在<sup>[7]</sup>。

### 2.1 外生性资源

外生性资源主要指的是那些并非根植于本土孕育出来的种种资源,包括中央政府和非本地的政策、资金以及技术等<sup>[11]</sup>。新内生发展理论认为,尽管人们拥有的与发展相关的专业知识是基于地方本土产生的,但这关键是由外部因素滋养的,外生性资源是新内生发展模式的必备条件<sup>[12]</sup>。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包括内生发展模式在内的所有类型的发展模式都离不开外生性资源的支持。既有研究表明,外生性资源对于乡村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大部分乡村地区本身较城市的发展滞后,在人口大量迁出带来的乡村“空心化”背景下,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内卷化”困境,外生性资源可以给予地方非常成熟的技术支持和相应的资金补贴,为落后的乡村社会直接提供发展动能,改善乡村发展环境,缓解内部发展困境,阻止乡村社会进一步衰落;另一方面,大部分乡村地区在发展初期,包括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各方面基础条件比较薄弱,基本上不具备自我挖掘其内生性潜能的能力,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刺激和推动,不可能实现内生发展<sup>[11]</sup>。外生性资源的介入可以有效撬动本土发展动力,激活地方内生性资源,促进地方内生发展。换言之,外生性资源为实现乡村内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 2.2 内生性资源

内生性资源指的是根植于地方内部的资源,主要包括地方本土的自然资源、人类技能和社会能力<sup>[11]</sup>。Ray将内生发展中的本土资源分为显性的内生性资源(有形资源)和隐性的内生性资源(无形资源),并认为在推进乡村内生发展的过程中,隐性的内生性资源更为重要<sup>[7]</sup>。

#### 2.2.1 显性的内生性资源

乡村社会本土物质性资源属于显性的内生性资源,主要包括3大类。一是自然资源,如土地、河流、矿产资源等,这其中,农业用地及其质量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内生条件<sup>[13]</sup>。二是经济资源,包括资金、生产工具以及地方基础设施<sup>[14]</sup>等。经济资源是内生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必备条件,地方经济资源越丰富,发展的潜力越大,越有可能较好较快地实现内生发展。三是实体性人文资源,包括工艺民俗、历史古迹、风景名胜等<sup>[7]</sup>,这些实体性人文资



源是提升乡村发展品质, 凸显村庄特色的重要基础。总而言之, 但凡地方内部所具有的可视的、蕴藏一定社会经济价值的“实体性资源”, 都属于显性的内生性资源, 这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乡村内生发展的趋势。

### 2.2.2 隐性的内生性资源

从内生发展视角看, 乡村社会还存在大量隐性的内生性资源, 它们主要以非物质形态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形式存在。

(1) 人力资本。乡村内生发展的本质是农民的发展, 决定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最重要的内生性因素是人力资本<sup>[13]</sup>。乡村内生发展强调发展进程中地方民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重视对人的能力的提升, 把发展的重点和着力点放在挖掘乡村精英、农民群体、乡村年轻人和发展工作者的人力资本上。

一是乡村精英。乡村内生发展离不开地方各类精英发挥作用<sup>[15]</sup>, 这其中, 乡村政治精英尤为重要<sup>[3]</sup>。村支书等政治精英往往掌控较多的内外部资源调配权, 对于地方发展策略有着比较大的话语权, 在挖掘乡村本土资源、促进农民群体团结、赋予地方参与者权利、激发农民群众的参与能动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 提升乡村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的人力资本水平, 对于乡村内生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是农民群体。农民是乡村社会的主人, 乡村社会能不能实现内生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群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Shucksmith 通过回顾英国的 LEADER 项目发现, 如果忽视地方非精英的能力, 会使得主动权逐渐掌握在精英群体手中, 社区边缘群体则会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这不利于社区可持续发展<sup>[16]</sup>。由此可见, 作为乡村社会主人的农民群体在乡村内生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三是乡村年轻人。在乡村社会, 相比于其他年龄段的村民, 年轻人思想更加活跃, 易于接受新事物, 改革的欲望较强, 是最具活力、最富有闯劲和创新精神的群体。研究表明, 乡村年轻人更愿意冒险, 在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以适应市场需要以及从国家和地方政府获得资金来源的可能性方面, 年轻人也更加灵活<sup>[13]</sup>, 他们是乡村内生发展中的先锋力量。

四是发展工作者。在国外乡村内生发展实践中, 往往需要雇佣一名专门负责在当地策划和实施发展

计划的发展工作者。他们具有与发展相关的专业技能, 是地方民众和基层政府的中间人, 与“超地方”的官员以及影响地方发展的各种参与者打交道<sup>[7]</sup>。发展工作者可以通过其专业化的知识与技能, 将宏观政策与地方实际进行结合, 凝练出符合地方发展规律的发展策略, 从而开启地方内生发展的进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乡村发展工作者承担着“乡村发展规划师”与“乡村社工”的职责。

(2) 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对于内生发展至关重要<sup>[17]</sup>。Ray 认为, 内生发展进程中的集体资源可以概念化为文化资本, 相较于实体性的文化资源, 以隐性形式存在的价值观、信念与态度、地方文化、传统习俗等非物质性文化资本往往发挥了更大的作用<sup>[7]</sup>。Jenkins 将内生发展模式的文化资本特别是隐性的文化资本的作用归纳为 3 个重要方面: 从工具角度看, 它们是要被开发或保护的资产; 从代表性上讲, 它们定义了地方认同; 从动员地方民众的意义上来说, 它们是地方伦理/道德和行为动机的来源<sup>[18]</sup>。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可以推进“自下而上”的发展进程<sup>[19]</sup>, 实现地方的可持续发展<sup>[20]</sup>。文化资本除了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以外, 还可以带来相当大的经济收益。不少乡村地区都是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融入乡村发展进程中, 着力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和特色乡村旅游模式, 以此活跃经济, 拉动消费, 提高农民收入, 促进地方的内生发展。

(3)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sup>[21]</sup>, Pilecek 等使用量化研究方法, 分析了社会资本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发现社会资本可以被看作是激活地方内生发展潜力的关键要素<sup>[22]</sup>。社会资本可以制度化为相关群体的团结规则<sup>[7]</sup>, 有利于改善个人面临的成本-利益平衡问题, 缓解政策方案中的“搭便车”问题, 从而促进实现相关政策的具体目标<sup>[23]</sup>。社会资本在促进内生发展的过程中, 其主要作用表现在 3 个方面。第一, 作为建立在信任和互惠准则等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 有利于促进地方民众之间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增强地方民众的认同感, 推动乡村内部协商机制和契约关系的形成与建立, 为地方内生发展提供良好的行动基础。第二, 社会资本相比于其他资源, 投入成本较低, 收益和回报较高, 稳定性较强, 可以有效缓解地方对于外部资源的高度依赖,

增强地方发展的自主性。第三,社会资本是促进地方民众自主参与的基础。内生发展强调地方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到地方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可以有效地激发地方民众的参与能动性,促进地方公-私、内-外等个人、群体与组织团结起来,建构旨在促进地方发展的稳固的地方行动团体与组织,从而推动地方内生发展战略的实施。

### 3 乡村内生发展视角下资源应用的国际经验

自从1975年瑞典哈马绍财团在联合国会议中正式提出内生发展这一概念<sup>[1]</sup>以来,国际上便陆续开始了包括LEADER项目等在内的种种乡村内生发展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成功地促进了地区的发展。国外乡村内生发展的案例表明,注重内外部资源的有机融合,着力挖掘地方隐性的内生性资源,是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

#### 3.1 注重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利用

诸多研究表明,内外部资源精准对接、深度融合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地方可持续发展的秘诀。Ray认为,在资源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乡村内生发展一定是内外部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sup>[7]</sup>。Pike等认为,地区的发展应该注重内外部资源的融合<sup>[24]</sup>。国外在推动乡村内生发展的实践中,有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整合利用好内外部资源,防止出现资源利用结构单一化的问题,避免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具体讲,就是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不能过度依赖内生性资源。研究表明,内生性资源固然是内生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但内生性资源的潜能往往需要外部力量撬动<sup>[25]</sup>。国外不少案例显示,内生发展强烈依赖市场、人才、技术、政策以及资金等外部资源的介入、激活和带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部分的乡村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没有完全融入现代市场体系,很多内生性资源一直处于“沉睡”状态,需要外部资源的介入,才有可能被激活。如果排斥外部资源,专门依赖内部资源尤其是某一种自然资源,必将面临严重的发展困境,产生类似“荷兰病”的问题,最终会出现“资源诅咒”的现象,变成经济发展的负担<sup>[26]</sup>,还可能造成土壤耗竭<sup>[27]</sup>这一严重后果。

第二,不能过度依赖外生性资源。戴维·兰德斯认为,外援可以有帮助,但是它像意外之财一样,

也会有害处。它可能降低自身努力的动力并造成一种有害的无能感<sup>[28]</sup>。外部资源尽管很重要,但只能是辅助性的,不能取代本土性资源在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外部资源的过度介入会遏制和排斥地方本土资源,削弱地方自主性和创造力,导致地方发展陷入路径依赖困境。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推动发展的进程中,正是因为长期过度依赖外部资源,出现环境污染、贫富悬殊、创新能力不足、发展动力减弱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后,才被迫转型,积极探索内生发展模式。日本在早期发展的时候,是典型的外生型发展模式,其地方的发展高度依赖外部力量的推动,这种发展模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其弊端,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暴发了“水俣病”,在此之后,社会各界开始反思外生型发展模式的问题,内生发展理念由此产生。欧洲同样如此,在发现“自上而下”式的外生型发展模式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后,才开始进行包括LEADER等在内的种种内生发展的实践与尝试。这表明,过度依赖外部资源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必须坚持以本土资源为主。

目前国外诸多案例表明,乡村内生发展往往是内外部资源有机融合的结果。西班牙阿尔梅里亚地区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末,阿尔梅里亚从一个落后地区成功发展为中等发达地区。该地区的成功发展离不开内外部资源的有机融合:一是地方本土资源。阿尔梅里亚地区具有良好的气候条件,充足的日照以及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有利于园艺作物的种植。二是技术支持。在国家种植研究所的帮助下,引入了新的耕作技术、塑料温室以及地下水开采技术,同时还获得了水、电等基础设施改善以及技术、财务等方面的帮助。三是市场条件。在欧洲市场日益开放的时期,园艺产品市场不断扩大。正是得益于技术和市场等外部资源的介入,充分激发了地方本土资源的内生潜力,阿尔梅里亚地区成功实现了内生发展<sup>[29]</sup>。由此可见,内生发展离不开内外部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整合利用,这是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一般路径和必然要求。

#### 3.2 着力挖掘地方隐性的内生性资源

乡村内生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内生发展尤其需要关注地方的本土资源,尊重地方的本土性<sup>[30]</sup>,着力挖掘地方内生性资源的潜力,发挥地方人力资

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隐性的内生性资源在内生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 3.2.1 挖掘地方的人力资本

实现内生发展的根本路径，就是要挖掘本土的人力资本，调动和激发地方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内生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例如，意大利南部“Daunia Rurale”地区为了发挥本地的资源优势，凸显发展特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充分激活了地方的人力资本。其具体操作过程主要分为4个步骤。第一步是邀请当地的专家和研究人員，对该地区进行实地调研，描绘出该地区的内外部特征，找到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第二步是邀请地方利益相关者（政府官员、农民、地方企业家、社会组织成员等）参加调查，通过问卷统计的方式选择并确定理想的未来发展方向。第三步是组织地方利益相关者召开专题研讨会，集体讨论发展方案，对不同的发展目标进行可行性分析。第四步是根据研讨会讨论结果，由地方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共同确定发展目标。正是通过采取上述措施，Daunia地区成功实现了内生发展<sup>[31]</sup>。Daunia地区的发展优势能够彰显，内生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关键在于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地方民众等利益相关群体的积极参与，激活了地方的人力资本。

### 3.2.2 挖掘地方的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内生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国际内生发展实践普遍重视乡村文化和历史传统，力图通过发掘乡村文化资本来推动地方内生发展。WASH<sup>①</sup>部门改善加纳农村环境卫生的实践就是一个通过发掘地方文化资源来推动乡村内生发展比较成功的案例。致力于乡村环境卫生改善的WASH部门，在加纳地区的卫生改善实践中，并没有直接复制和沿用在其他地区已经获得成功的发展模式，而是先对当地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访谈，了解当地的传统习俗和文化禁忌，在设计发展规划时，充分尊重当地用水文化、卫生理念、传统仪式和民俗禁忌等，并将这些地方的文化资本应用到了取水用水工程改造和厕所建造改造中，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认同，调动了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使得WASH部门顺利地完成了项目建设任务，改善了当地的环境卫生状况，推动了当地的社会发展<sup>[17]</sup>。在该案例中，WASH部

门将其先进管理经验、卫生技术与加纳地区的包括传统、习俗等在内的地方文化资源相融合，从而获得了成功。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在推进乡村内生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尊重地方本土文化，着力挖掘本土文化资本的潜在价值。

### 3.2.3 挖掘地方的社会资本

乡村内生发展，离不开乡村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等乡村社会资本的支撑。国际上关于内生发展的一个普遍经验就是着力挖掘地方本土的社会资本。奥地利Lesachtal地区的发展就是一个通过挖掘本土社会资本实现内生发展的成功案例。Lesachtal地区由于位置偏远，地形复杂，发展动力较弱。为了改变这一处境，该地区与旅游企业合作，同时与各种不同的行政部门和社会团体进行讨论与协商，旨在寻求共同的发展目标，实现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一系列讨论之后，该地区制定了相应的团体规则与互惠规范，充分激活了社会资本，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该地区的具体做法包括：将当地每家酒店的最大床位数量限制在70张，通过实施促进传统二层建筑的建筑法规来保护建筑特色，不提供支持滑雪的技术基础设施（缆车等），保护有价值的文化景观等。基于以上规定，该地区成功发展了旅游业，实现了内生发展<sup>[32]</sup>。在该案例中，Lesachtal地区成功实现内生发展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是建立了一系列的互惠规则，构建了地方利益共同体，挖掘并积累了社会资本，从而有效激活了地方内生发展动力。

## 4 推动中国乡村内生发展的路径分析

内生发展视角下资源的内涵及其应用的国际经验表明，资源和内生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图1），推进乡村内生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合理配置乡村内外部资源，着力挖掘乡村隐性的内生性资源的潜力。这无疑为推进中国乡村内生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当前，如何整合利用乡村内外部资源，尤其是挖掘乡村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潜在价值，推动乡村内生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这是理论和实践中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本文

① WASH是一个由水（water）、卫生设施（sanitation）以及个人卫生（hygiene）组成的集合词。



认为，赋予地方合理的权力，培育农民的自主性，制定科学合理的内生性发展规划，统筹利用好内外

部资源，是实现中国乡村内生发展的基本路径和关键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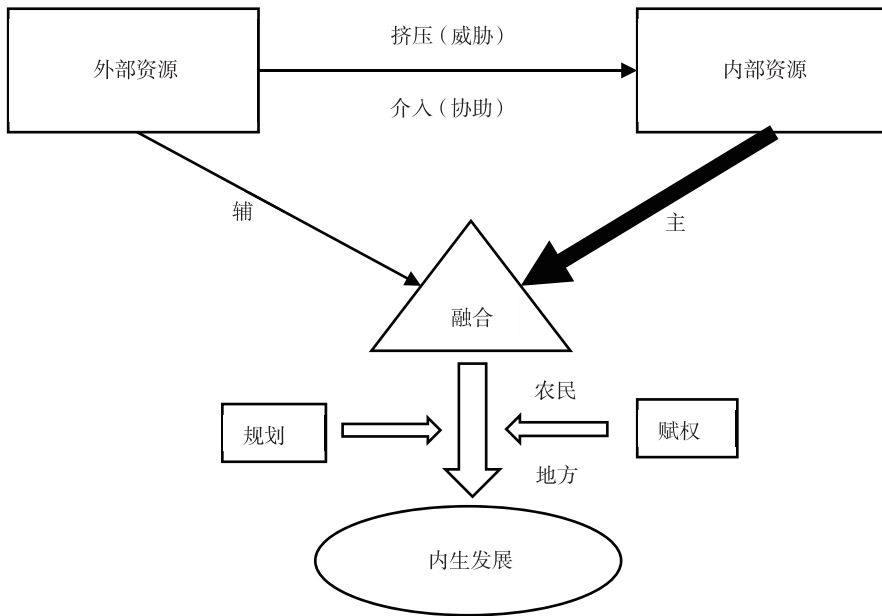


图1 资源与内生发展之间的关系

#### 4.1 合理赋予地方权力

内生发展的先决条件在于权力下放<sup>[32]</sup>，合理赋权可以保证地方拥有资源应用的自主性和决策权。研究表明，新内生发展的基础是通过地方行动者的网络，建立起本土资源价值的竞争力<sup>[33]</sup>。通过对众多国外的内生发展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地方行动小组（LAG）这一概念经常作为内生发展的行动单元和关键要素出现。LAG是由公共、民间和私人部门所组成的伙伴关系，是LEADER项目最明显的表征<sup>[34]</sup>。LAG拥有地方发展项目的财政决策权<sup>[35]</sup>，通过对本土资源的价值进行评估和开发，并鼓励地方民众积极参与，从而制定发展行动的“商业计划”，申请获得LEADER项目资金<sup>[7]</sup>，有效促进地方的可持续发展。

推进中国广大乡村地区内生发展，必须合理地赋权于地方，建立类似LAG的具有实质性权力的乡村组织，令其具备制定决策、申请资金、调配资源等事项的自主权力，也就是说，把部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决策权以及资源配置权从国家转移到乡村基层，增强地方自主性，从而推动乡村内生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权力的赋予不是无限制的。Bosworth等在对英国的LEADER项目开展评估之

后发现，将自治权完全下放给内生群体实际上可能会产生反效果。主要原因在于乡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往往会受到外部政策方案和评估措施等的影响<sup>[33]</sup>，如果权力全部下放给地方，可能会对既有的制度性权力结构产生冲击，上级无法对地方进行有效监管，形成狭隘的地方主义，导致地方发展偏离正轨。

#### 4.2 培育农民自主性

农民是农村的主人，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要实现乡村社会内生发展，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挖掘农民的人力资本，调动农民积极性和能动性。然而，从目前中国乡村发展现状看，农民的自主性还比较弱，主动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意愿不足。造成这一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民的权利缺位。在现行的乡村权力结构体系中，农民处于边缘化位置，在乡村发展进程中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等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基本上是以“客体”的角色被动地卷入其中。尽管党和政府在农村一直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长期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被阻隔在乡村权力之外。这种权力的区隔弱化了农民的主体地位，降低了农民的自主性，也使得以农民

为主体建立的如农民合作社等互助型组织,难以真正健康运转并发展壮大,由此导致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还权于农民,增强农民的自主性,是推进乡村内生发展的必由之路。

#### 4.3 科学制定内生发展规划

Ray 认为,LEADER 项目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关于参与和创新的定义,而是强调探索性的发现<sup>[7]</sup>。这就意味着地方的发展不能完全复制已有的经验,更不能由外部“给定”某种固定的路径,而应该立足本地,充分考虑到地方的资源禀赋和各方利益诉求,积极探寻有利于内生发展的本土路径。为此,必须做好前期的资源评估和实地调研工作,科学制定内生发展规划,这是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规划的制定实际上是地方利益群体与国家权力代表进行协商的一个过程。通过制定科学规划,构建有利于乡村社会稳定发展的各种公平性规则,保障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实现利益的共享和风险的共担,促进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良性互动,积累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和有效整合各种发展资源,形成特色的发展模式。乔杰等在对中国中部贫困山区乡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科学合理的乡村规划有助于促进乡村的全面发展<sup>[36]</sup>。荷兰北部的弗里斯兰省 Vel&Vanla 环境合作社相关实践<sup>[37]</sup>表明,发展前的规划制定是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重要步骤。由此可见,乡村社会要实现内生发展,必须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科学规划。

#### 4.4 推进乡村内外部资源深度融合

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内生发展,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内外部资源之间的关系,既要积极引进利用好外生性资源,又要坚持以挖掘开发内生性资源为主,做到两种资源深度融合、协同发力。

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要推进乡村内外部资源的深度融合,必须从 3 个方面入手:一是依赖行政手段来推进。把“自上而下”的发展战略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本土发展诉求结合起来,把政府的政策、技术、管理、资金等各项扶持措施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结合起来。当前,中

国不少乡村地区缺乏资本、技术和人才,外生性资源严重不足,迫切需要国家动员各种资源投入到乡村发展中去<sup>[38]</sup>。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配置内外部资源,把外部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引进来,使其与地方本土内生性资源融合共生。三是借助社会力量,如通过发挥“两新”组织、志愿者组织和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影响,整合内外部资源,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乡村内生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张文明,章志敏.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2018(11):75-85.
- [2] 叶裕民,戚斌,于立.基于土地管制视角的中国乡村内生性发展乏力问题分析:以英国为鉴[J].中国农村经济,2018(3):123-137.
- [3] 张文明,袁宇阳.都市郊区内生发展的个体要素表征:基于上海市 9 个村的实证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0(6):133-143+176-177.
- [4] 张玉强,张雷.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上海市 Y 村的案例考察[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5):497-504.
- [5] 闰彩霞.后乡土社会背景下乡村振兴的策略与路径:基于内生发展的分析视角[J].兰州学刊,2019(4):173-183.
- [6] RAY C. Towards a meta-framework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repertoires, paths, democracy and rights [J]. Sociologia ruralis, 1999, 39(4): 522-537.
- [7] RAY C. Culture economies: a perspective on local rur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M]. England: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Dep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Food Marketing,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 2001.
- [8] 王利华.“资源”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33(4):35-45.
- [9] 皮埃尔·布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10] SALEMINK K, STRIJKER D, BOSWORTH G. The community reclaims control? Learning experiences from rural broadband initiatives in the Netherlands [J]. Sociologia Ruralis, 2017, 57: 555-575.
- [11] MÜHLIGHAUS S, WÄLTJ 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Swiss mountain communities [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1, 21(3): 236-243.
- [12] LOWE P, PHILLIPSON J, PROCTOR A, et al. Expertise in rural development: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 World Development, 2019, 116: 28-37.

- [13] SZYMAŃSKA D, CHODKOWSKA-MISZKZUK J. Endogenous resources uti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shap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Poland [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1, 15 (3): 1497-1501.
- [14] SHARP J S, AGNITSCH K, RYAN V, et al. Social infrastructure and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case of self-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recruitment in rural Iow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2, 18 (4): 405-417.
- [15] 陆学艺. 内发的村庄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16] SHUCKSMITH M. Endogenous development,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inclusion: perspectives from LEADER in the UK [J]. *Sociologia Ruralis*, 2000, 40 (2): 208-218.
- [17] ZAKIYA A S. Centring African culture in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development praxis in Ghana: a case for endogenous development [J].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014, 24 (5-6): 699-713.
- [18] JENKINS T N. Putting postmodernity into practic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in the rural development of marginal region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0, 34 (3): 301-313.
- [19] GAROFOLII G. Lo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theoretical model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02, 9 (3): 225-239.
- [20] HIGH C, NEMES G. Social learning in LEADER: exogenous, endogenous and hybrid evalu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J]. *Sociologia Ruralis*, 2007, 47 (2): 103-119.
- [21] VAN DER PLOEG J D, RENTING H, BRUNORI G, et al. Rural development: from practices and policies towards theory [J]. *Sociologia Ruralis*, 2000, 40 (4): 391-408.
- [22] PILECEK J, CHROMY P, JANCAK V. 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zech Peripheries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3, 104 (5): 604-620.
- [23] NARDONE G, SISTO R, LOPOLITO A. Social capital in the LEADER initiative: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 (1): 63-72.
- [24] PIKE A, ANDEÉS R P, TOMANEY J. Loc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25] BOSWORTH G, ATTERTON J. Entrepreneurial immigration and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J]. *Rural Sociology*, 2012, 77 (2): 254-279.
- [26] 林毅夫. 资源是如何从有利条件变成负担的? [J]. *发展*, 2017 (3): 30-31.
- [27] MEULEN H, VENTURA F.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and reinforcing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from Umbria [M] // PLOEG J D V D, DIJK G V. *Beyond modernization: the impact of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Assen: Van Gorcum, 1995.
- [28] 戴维·兰德斯. 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 [M] // 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作用: 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
- [29] GALDEANO-GÓMEZ E, AZNAR-SÁNCHEZ J A, PÉREX-MESA J C. The complexity of theories on rur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 analysis of the paradigmatic case of Almería (South-east Spain) [J]. *Sociologia ruralis*, 2011, 51 (1): 54-78.
- [30] RAY C.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reflexive modernity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9, 15 (3): 257-267.
- [31] SISTO R, LOPOLITO A, VAN VLIET M.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using backcasting to support local action groups in complying with CLLD requirements [J]. *Land Use Policy*, 2018, 70: 442-450.
- [32] DAX T.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Austria's mountain regions [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1, 21 (3): 231-236.
- [33] BOSWORTH G, ANNIBALI I, CARROKK T, et al. Empowering local action through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LEADER in England [J]. *Sociologia Ruralis*, 2016, 56 (3): 427-449.
- [34] LUKIĆ A, OBAD O. New actors in rural development-the LEADER approach and projectification in rural Croatia [J]. *Sociologija I Prostor*, 2016, 54 (1): 71-90.
- [35] POLLERMANN K, RAUE P, SCHNAUT G. Rur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in Germany: opportunities and obstacles in fostering smart places through LEADER [J]. *Studi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3, 115 (2): 111-117.
- [36] 乔杰, 洪亮平, 王莹. 全面发展视角下的乡村规划 [J]. *城市规划*, 2017, 41 (1): 45-54+108.
- [37] PLOEG J D V D, RENTING H. Environmental co-operatives reconnect farming, ecology and society [M] // HAVERKORT B, HOOFT K V, HIEMSTRA W. *Ancient roots, new shoot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Leusden: ETC/Compas; London: Zed Books, 2003: 222-227.
- [38] 丁生忠. 内外资源聚合转换驱动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J]. *理论学刊*, 2019 (5): 141-150.

# 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一般性解释框架

◆ 胡冰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绿色革命以来,随着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展,全球农产品市场的约束条件已经从传统的产出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面对约束条件的变化,商品农业的竞争性技术进步必然导致农业生产要素需求的下降,其表现为部分农业生产资源的退出或要素价格的下降。由于要素价格调整存在社会刚性,现实中则是通过农业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张来间接降低要素价格。与此同时,由于农业生产资源的可扩展性,使得传统意义上商品农业的规模水平进一步提高,加之全球农产品市场相互作用,市场寡占作为竞争结果未必带来相应利润,这也与一般社会认识有所不同。本文基于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一般性解释框架,最后进行了针对中国农业内嵌于全球农业的政策讨论。

**关键词:** 农产品市场;需求约束;商品农业;要素价格;市场寡占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0.06.003

从理论上讲,一国的农产品生产效率在大体上服从比较优势原理,主要反映要素禀赋状况。尽管实际问题比理论概括更为复杂,但是并没有对理论构成太大挑战。就农产品而言,一般认为生产要素为自然资源(土地、气候等)、农业劳动力、物质资本、农业科技,除此之外还需要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社会文化等因素。从案例角度,如果分离相关因素,独立讨论某(几)种要素的作用,难度比较大;如果从经验模型角度,那么很多因素由于数据缺乏或者口径不一致,往往又难以量化。当前,从全球农业发展来看,农业生产效率,或者说成本收益的国别比较实际是比较困难的。面对这一问题,笔者尝试从结论出发,反向讨论全球农业生产效率问题,主要为相应研究提供另一种视角。

## 1 农业成本收益长期处于“紧平衡”

农业成本收益与农业生产效率存在很大关系,但是从不同角度看又不尽相同。对某个单一主体而

言,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标志是成本收益状况的优化,但是从国家角度,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结果往往是成本收益状况的恶化。开放条件下,农产品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生产竞争的结果是整体效率提高,由于市场容量限制,从而导致成本收益恶化,“谷贱伤农”“丰收悖论”与此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这一结论可以通过直观事实获得支撑。

以美国为例,如果按照经济成本核算,1975年以来,小麦、玉米的成本收益率总体平均为负(图1)。当然,如果不考虑劳动力机会成本、资本折旧、土地租金这些隐性成本,单纯从简单账面计算来看,小麦玉米存在一定的现金利润。对比经济成本核算与简单账面计算的差距,不难发现:美国农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承载了一部分就业和农业专用资产运转(如拖拉机)功能,但是这种承载在很大程度上

收稿日期:2020-05-25。

作者简介:胡冰川(1980—),男,安徽枞阳人,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产品贸易。



是内卷化，而不是可持续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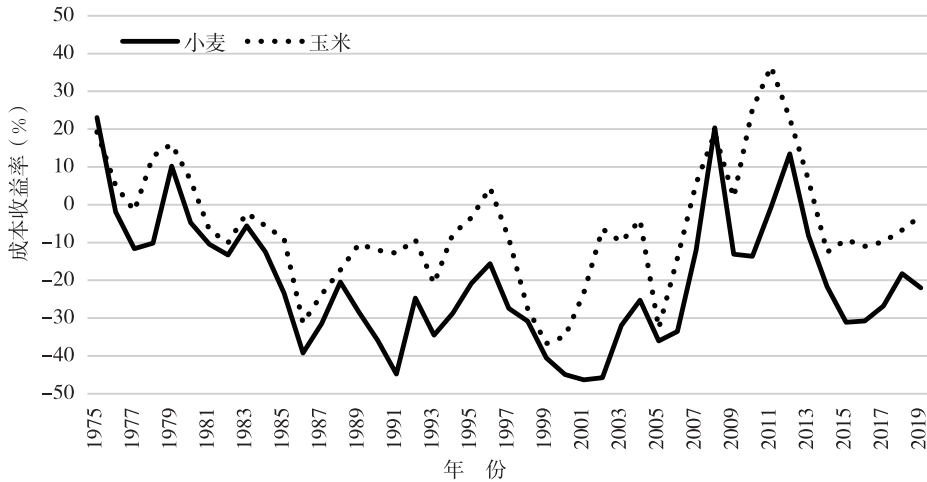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小麦、玉米成本收益率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

美国农业的经济核算亏损与简单账面盈利的反差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全球商品农业都存在的共性问题。中国农业也是如此，从政府角度，认为只要存在现金收益，那么维持现行农业生产不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需要，同时也是稳定农业就业的需要。从经济理论上讲，对于经济核算亏损与简单账面盈利的问题，只要当期收益能高于当期平均可变成本，那么生产仍将会进行下去，但是在实际生产中，这种最低生产形态并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原因是无法继续更新固定成本。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美国农场兼并与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农业生产也存在大规模土地流转；与此同时，所有发达形态的农业生产者都在日渐老龄化。对于全球农产品市场，其运行机制都具备逻辑一致性，即存在一般性的解释框架。

## 2 全球农业产出受制于需求约束

农业成本收益长期处于“紧平衡”的根源在于市场供需的紧平衡，传统观念认为市场供需的紧平衡源于供给的有限性，包括农产品价格长期上涨<sup>[1]</sup>、人与食物之间的平衡关系都是具体表现<sup>[2]</sup>。这一观点实际反映的是生计农业的逻辑。目前来看，该逻辑在粮食政策领域中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当然这也和研究视角有关，毕竟认识差异主要来源于全球农业中的生计农业和商品农业的模式差异。

如果单纯讨论生计农业模式，那么可以沿用供

给约束的逻辑；但是从全球农产品市场发展来看，随着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那么逻辑起点与解释框架将会发生本质变化，从生计农业走向商品农业的模式转变必将越来越明朗，因此逻辑起点和解释框架必须进行更新，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

在一个现代的全球农产品市场中，真正的市场供需紧平衡的原因来自需求约束，类似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一样，人类的食品需求也存在明确饱和边界，这与传统的供给决定论的逻辑起点完全不同。对应的现实是：美国、巴西、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农产品消费需求早已饱和，中国食品消费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和多元化升级以后也正在接近饱和，低收入国家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也在不断快速增长，食物产出对人类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弱。

市场紧平衡的根源在于需求约束而不是生产约束，对此可以佐证的事实是：

(1) 全球营养不良人口的快速下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2年以来，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数量从15.1亿人降低到10.8亿人，同期全球总人口数量从62.7亿人增长到75.9亿人。如果基于更长时段的历史经验，那么在有限的将来，人类将会彻底消灭营养不良，这完全得益于全球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相反地，全球营养过剩人口数量在不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全球5岁以下儿童超重发生率从1990年的4.9%增长到2019年的5.5%，以此可以传证。

(2) 农产品价格长期下降。农产品价格长期走

势甚至不是相对下降,而是绝对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10年1月至2020年4月,农产品价格指数从100.7下跌到92.8,10年多的时间跨度,全球农产品价格总体下降了7.8%。从具体产品角度,以小麦为例,1980年1月的小麦价格为每吨175.6美元,2020年3月低点时的小麦价格为每吨170.9美元(图2)。显然,农产品价格长期下降的背景是供给相对过剩,即需求约束而非产出约束。

(3) 全球贸易争端的多数来源是市场过剩。全

球贸易体系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进化到WTO以来,主导农业谈判的3大支柱分别是: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毫无疑问,3大支柱所隐含的背景是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而非短缺。从逻辑上讲,在一个农产品相对短缺或存在供给危机的世界中,各国不会对农产品出口采取鼓励措施,也不会对农产品进口设置进口障碍。在国际贸易中,出口限制对应短缺、进口限制对应过剩,对此,不妨参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时,部分国家对农产品出口进行限制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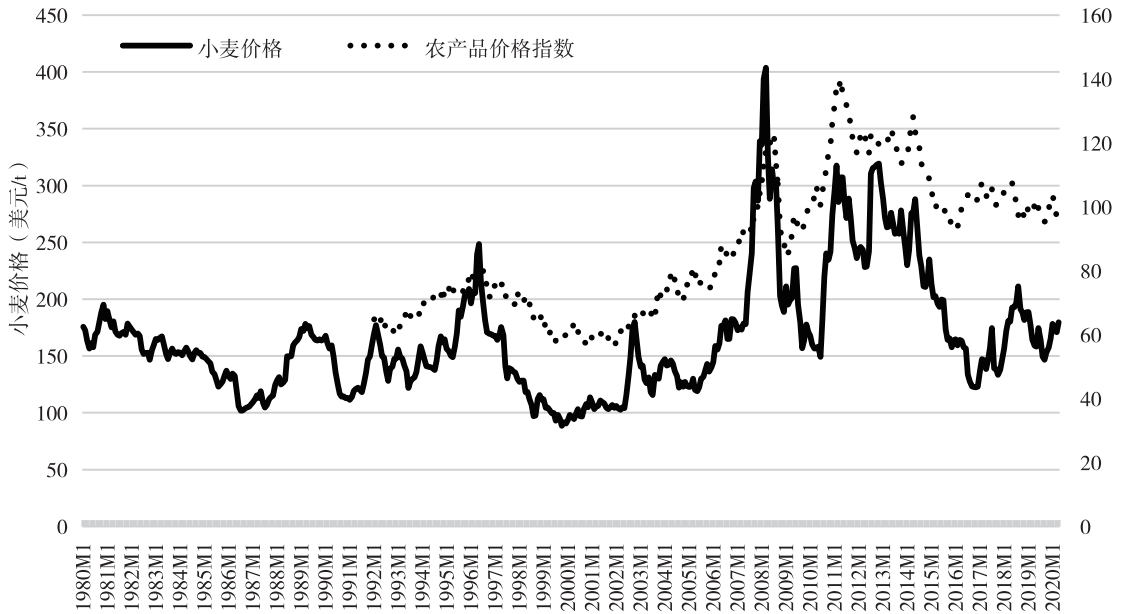


图2 全球农产品价格指数与小麦价格

注:其中农产品价格是以2016年平均数为100的指数(右轴);小麦价格为美国堪萨斯1号硬红冬小麦价格(左轴)。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3 农业生产要素的数量与价格调整

在全球农产品受到需求约束的背景下,由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产出增长,使得全球农产品价格长期下降。更重要之处在于,在需求约束之下,生产效率的提升是通过降低成本,即资源节约的方式进行的,其表现为单位产出所消耗的投入要素下降。这就意味着:在等产量条件下,全球农业要素资源需求是持续下降的。显然,农产品价格的调整要比要素价格调整更为灵活,农产品可以通过降价方式实现市场出清;此时,如果农业要素价格不变,那么农产品生产成本就会相对提高,农业生产利润就会下降甚至进入长期亏损。

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持续机制的内生要求莫过于:要么是农业生产的要素价格下降以适应效率增长,要么是一部分农业生产要素退出农业生产从而维持既有要素价格水平。在现实中,名义上降低农业生产的投入要素价格几无可能,其结果必然是农业生产相对成本长期上升,农业投入产出状况恶化。尽管最低生产水平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会因为投入要素无法更新,最终导致一部分农业生产要素退出农业生产,包括一部分土地闲置、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业投资退出或转移;同期产生的还有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甚至高龄化。

当然,在现实农业生产中,更多的是另一种情形:农场的规模化、大规模化和超大规模化。对于

微观层面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而言, 规模化只是通过迂回方式, 以提升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来降低平均要素成本, 属于间接地降低要素价格。意即, 在要素名义价格无法调整的情况下, 可以利用效率方式改进要素配置方式, 从而迂回降低要素价格。除了土地价格的迂回降低之外, 对于农业资金而言, 巴西农村信贷系统 (SNCR) 不仅便利了农村资金获取, 更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资金价格, 加速了巴西现代农业的发展<sup>[3]</sup>, 这一点也是值得中国借鉴的重要经验。

纵观美国的农场兼并、中国的土地流转, 其根本原因都在于此。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 从国别角度来看, 农产品市场平衡条件取决于农业生产。但是, 中国作为农产品市场高度开放的国家, 在一价定律作用下, 国内农产品价格大体与国际农产品商品接轨<sup>①</sup>, 倘若存在较大的差价, 那么势必通过贸易方式予以平衡。如果承认全球与中国农产品的市场整合, 而同时国内要素价格存在较大差异, 那么国内农业生产要么面临成本压力过大导致要素退出, 要么就是流转之后的规模化。

#### 4 农业资源扩展的延伸讨论

上述讨论一直基于现有农业生产资源不变的假设。而现实情况是, 全球农业生产资源仍在不断扩

张。在农业生产资源可扩展的条件下, 又涉及商品农业与生计农业的两种生产模式。简单以谷物耕地面积为例, 按照世界银行公布数据, 2000—2017 年全球谷物耕地面积从 6.6 亿  $\text{hm}^2$  增长到 7.3 亿  $\text{hm}^2$ , 共计增长了 7 000 万  $\text{hm}^2$ , 其中中低收入国家谷物耕地增加了 8 300 万  $\text{hm}^2$ , 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则减少了 1 800 万  $\text{hm}^2$ 。

通过数据变化, 不难发现: 生计农业模式仍然在不断扩展农业生产资源, 而商品农业模式却更加注重要素集约化。显然, 两种生产模式背后的逻辑并不一致, 主要在于约束条件不同, 不同于商品农业的约束条件是需求, 生计农业的约束条件仍然是生产。中低收入国家满足粮食消费和生存更多地依赖生计农业模式, 由于不以交换为目的, 效率竞争机制并不存在, 所以为了平衡食物与人口的关系, 往往只能通过扩展农业资源实现。而 OECD 国家早已进化到商品农业模式, 基本都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生产的可持续, 因此符合农业生产资源退出生产的论断。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现象是, 在 OECD 国家农业资源逐步退出的过程中, 巴西农业资源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 2000—2017 年, 巴西谷物耕地增长了 500 万  $\text{hm}^2$  (图 3), 增长了 28.5%, 如果考虑未纳入官方统计的谷物耕地, 实际增长会更大。对于巴西耕地增长的问题, 并不违背前述结论, 同时还是对商品农业模式下要素匹配的现实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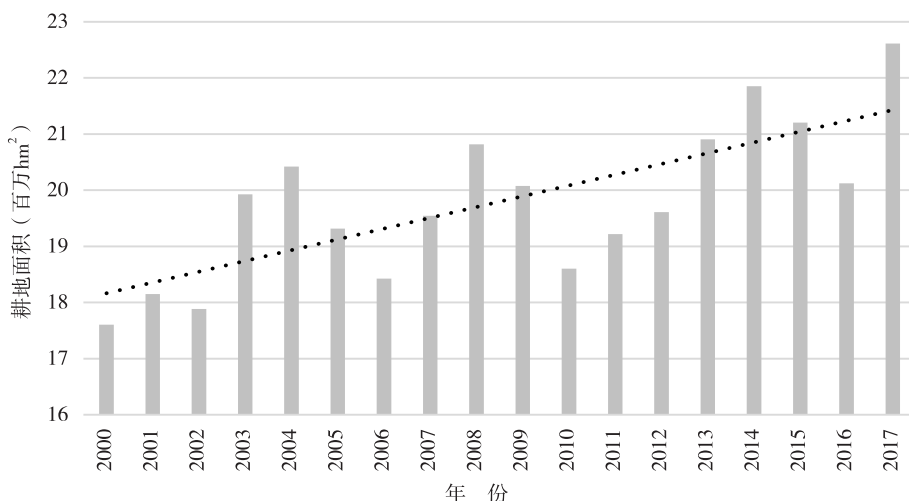


图 3 巴西谷物耕地面积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① 尽管中国农产品价格体系已经对全球农产品价格体系产生了影响, 但是这种相互影响并不排除中国对全球农产品价格的接受。

从农业生产资源来看,以耕地资源为例,巴西农业资源丰富,而且耕作基本采用规模化方式进行,农业资源的相对宽松使得巴西农业资源的介入生产的价格相对廉价,这符合要素禀赋原理。随着全球农产品市场开放和贸易扩展,包括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拉动了巴西农产品生产,扩张性的需求理论上会增加生产成本与资源价格,技术进步的偏向往往会转向产出最大化,而非成本最小化。

然而,巴西耕地潜力巨大,尽管在耕地开垦和环境保护方面有着比较严格的法律约束,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耕地增加,原因在于利益驱动和监管不严。大量新增加农业资源不仅有效抑制了土地价格的上涨,而且形成了更大范围的规模化经营。新增土地抑制土地价格上涨与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在理论上具有一致性,这也意味着新增农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压低了农业生产的要素价格,导致市场竞争国家的农业退出或规模化加剧。

至此,可以对上述分析进行简要小结:在全球范围内,商业农产品交易面临需求饱和的限制性约束,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完全是自发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竞争带来的被动结果。在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背景下,商品农业实际需要的农业资源在长期相对下降,其必然结果要么是农业资源价格下调以匹配资源需求,要么是部分农业资源退出。从全球农业发展来看,对应的两个事实存在于,农业资源价格下调是通过规模化和资源重组迂回实现的,或者是发达国家农业生产资源的退出。根据这一解释性框架,对现有全球农业生产格局可以起到很好的解释作用,如发达国家休耕补贴等相关农业政策都可以在此框架下获得解释。

在全球农业的商品模式之外,进一步地讨论包括生计农业与资源扩展。如果条件放宽,上述框架依然能够做出很好的解释。农业资源扩张实际上是恶化了需求约束,加剧了农业资源的价格下降,使得商品农业的大规模化加剧或者非效率农场的退出加剧。同样地,尽管前文没有提及生计农业的影响,与农业资源扩展相一致,当生计农业生产增加,很大程度上间接强化了全球商品农业的需求约束,宽松了产出供给,进而降低了农业资源需求,加剧了农业大规模化或自愿退出。

## 5 关于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

综合之前讨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主要约束来自需求饱和,理由是发达国家的食物消费饱和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提升。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部分国家采取了临时性的农产品出口限制措施,也加剧了农产品进口国的恐慌。供给减少与需求增长实际是同一个问题,疫情背景下出口限制与农产品市场需求增长能否改变全球农产品市场格局?对此,可以从问题本身入手:需求增长能否改变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主要约束条件,即市场总需求长期超过总供给的可能性。

这个问题本身不是现代问题,绿色革命之前,人口与食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影响人类发展进步的强约束,至今中低收入国家的生计农业仍然处于这一阶段,在该阶段农产品供给约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站在现代视角,全球农产品市场的约束条件从供给转向需求是发展必然,不妨通过历史视角加以归纳:

第一,历史上的农产品供给约束主要源于生计农业在低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力过密与社会封闭。英国工业革命的同时发生了食物革命,小麦取代了其他谷物的地位,面包成为人们的主食<sup>[4]</sup>,除了小麦产出增加之外,关键原因是小麦贸易的大幅度扩展,专业分工促进了农业生产与产出分配的更高效率,从而使得农业生产的相对过剩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农产品的供给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封闭。

第二,市场开放只是农产品供给约束放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时期,各主要工业化国家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粮食危机。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直到新千禧年之前,发达国家的粮食危机大大降低,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能够看到,在19世纪90年代农业“机械革命”、20世纪初的农业“化学革命”、20世纪前半叶“杂交育种革命”之后,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一步发展,使得农业的产出增长突破了人口增长的限制,农产品市场中的约束条件从生产转向需求。

第三,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以产销高



度分离为标志的全球农产品市场逐步形成<sup>[5]</sup>, 中国食物消费快速增长带来农产品进口增长并没有改变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供给宽松格局, 高度专业化的大豆生产与贸易不仅满足了中国的进口需求, 同时也扩张了全球大豆产能。中国需求增长相当于将农产品需求可能性边界进行了外扩, 过去 20 年数据表明, 全球农业生产能够很好地支持中国食物需求的增长(图 4)。

据此, 可以推广到一般情况, 如印度等其他国家的农产品需求一旦快速增长, 全球农业生产完全可以满足这一增长。毕竟从时间维度来看, 全球农产品市场需求增长是连续而非间断的, 供给增长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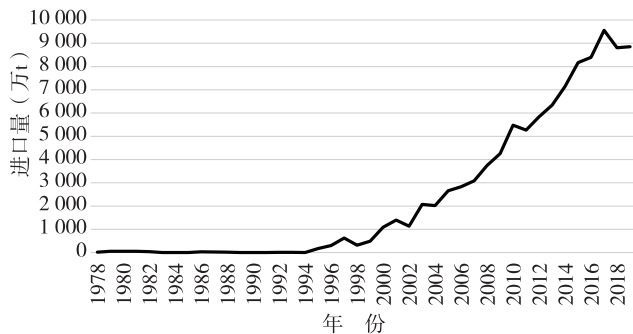


图 4 大豆进出口量

数据来源: 历年海关统计年鉴。

## 6 全球农产品的市场寡占

全球农产品市场寡占是普遍现象, 始终有部分观点将农产品市场寡占现象等同于 4 大粮商, 进而对全球粮食贸易体系进行攻讦。事实上这种观点站不住脚, 除了粮食之外, 全球农产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高集中度问题, 这一现象姑且称为“市场寡占”。从形态上来看, 全球农产品的市场寡占可以覆盖农业价值链全部环节, 包括生产、收购、贸易、加工、销售等, 在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可能会出现市场寡占。其中涉及的问题比较多, 既有政策限制带来的行政垄断, 也有市场竞争之后的自然垄断, 还有种质资源领域的知识产权垄断。

实际上, 全球农产品的市场寡占多数原因是自然垄断, 属于市场竞争的结果。从农业生产来看, 由于受到需求约束导致农业生产的规模持续扩张, 本质上是通过迂回方式降低要素价格适应市场。这一逻辑同样适合用来解释全球农产品市场寡占, 如

果不考虑行政垄断和知识产权垄断, 由于全球农产品市场并不存在准入限制, 自然垄断型的市场寡占是具备存在合理性的。

进一步考虑行政垄断带来的市场寡占问题, 历史上加拿大小麦局(1935—2015 年)、澳大利亚小麦局(1939—1999 年)都以法律形式垄断国家小麦的购销与贸易, 其产生的根源是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与农户自身抗风险能力低下, 其运行的目的在于通过稳定市场来稳定农业生产, 保障农户与国家利益, 其最终取消则源于外部压力加剧和内部效率低下<sup>[6]</sup>。可以认为, 农产品市场的行政垄断产生于历史, 消亡于历史。在农产品领域, 以法律形式进行国家垄断贸易相对较为极端, 但是以合作社方式进行的细分产品寡占就十分常见, 本身合作社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取某种市场支配力量, 显而易见的是面对现代农产品市场竞争, 相比合作社组织成本而言, 其市场地位日渐式微<sup>[7]</sup>。以新西兰恒天然为例, 从垄断奶源的合作社走向公司化运营的全球企业, 足以说明在农产品领域, 依赖市场支配地位攫取超额利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之所以如此, 包括两方面原因: 其一, 在传统的农产品区域市场上, 有组织形态的生产商与贸易商往往容易通过市场寡占获得超额利润, 使得生产经营主体倾向于有组织的市场寡占, 但是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的空间范围内, 很难再复制区域市场垄断成功经验; 其二, 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产品属性与时空界限日趋模糊, 使得垄断自身的成本与收益变得难以维系。

可以通过直观事例进行说明: 在当前全球农产品市场中, 如果美国垄断大豆贸易, 那么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的大豆出口也会迅速增加; 进一步地, 即使美国垄断了所有的大豆贸易,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出口会形成替代。因此, 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中, 市场寡占将最终回到效率竞争的自然垄断状态, 而自然垄断是竞争结果, 并非存在的问题。

## 7 对中国的启示与政策讨论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中国迅速从生计农业走向商品农业,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 2016

年,全国农业经营户 20 743 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 398 万户。如果考虑规模农业经营户的权重,结合土地流转实际,不难发现中国生计农业模式正在加速瓦解,商品农业已经成为现有农业生产的主导形态。作为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全球农产品与要素市场对国内农业生产的影响日趋显现,其中农业生产成本的持续增长是表现之一,这也加速了生计农业的退出与商品农业的进一步规模化。

在此过程中,相应的国内支持主要通过个别品种的价格支持以维持必要的产出数量,在某种意义上刺激了国内农业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进一步拖累了整体农业生产。根据此前分析,随着全球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要素价格会持续相对下降,如果国内要素价格或供给不能做出相应调整,那么农业生产的成本收益状况会持续恶化。

除了价格支持和直接补贴之外,从中国粮食安全的公共政策出发,可以考虑承担更多的生产要素更新成本,毕竟大规模的要素更新更显效率。例如,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整治,按照每亩 3 000 元计算(1 亩=1/15hm<sup>2</sup>),6 亿亩需要 1.8 万亿元,2020—2035 年分 15 年投资,年均投入 1 200 亿元。从远期角度,需要对土地流转等制度设计进行优化更新,切实降低土地流转成本,提高农业竞争力。

再进一步地,从农业长期发展来看,以专利、知识产权为手段的要素获利方式将成为主导<sup>[8]</sup>,农业科技创新以企业为主体已经是社会共识。对于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涉及政府投入和公共财政的农业科技而言,迫切需要对现行体制机制进行优化,除了增加奖补之外,对农业科技分配方式应当建立必要的竞争和监督机制,例如,对财政投入的科技资源进行分配权、使用权、评价权的分置改革,提高监督水平,提升财政投入效率。

随着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张,在需求边界的约束下,供给侧的市场寡占地位未必是优势地位。相对而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在某种意义上理应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这种利益获取很难通过对对手交易的讨价还价获得,但是可以通过时空迂回实现。可以考虑构建以农产品贸易为载体的,面向全球的贸易枢纽网络<sup>[9]</sup>。例如,以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为主体,以云南花卉生产和国内花卉

消费为依托,以现代物流体系和交易手段为支撑,进一步构建覆盖全球的花卉交易市场。中国食物消费多元性本身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巨大体量的国内市场为打造全球农产品贸易枢纽网络提供了可能,除大宗产品之外,其他如水产品、热带农产品、期货产品等都可以套用,策略在于:如果交易品种越多,手段越复杂,那么迂回套利空间才会越大。

随着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农业已经深刻嵌入全球农业发展之中,面对大的发展趋势,国内农业支持政策需要更灵活地调整,以顺应时代发展需要。

### 参考文献

- [1] TROSTLE R. Global agricultural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recent increase in food commodity prices [R]. New York: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008.
- [2] ALEXANDRATOS N, BRUINSMA J. World agriculture towards 2030/2050: the 2012 revision [R]. ESA Working paper No. 12-03, 2012.
- [3] 赫伯特·克莱因, 弗朗西斯科·卢纳, 王飞, 等. 巴西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与结构性问题 [J]. 拉丁美洲研究, 2019, 41 (5): 68-84+15.
- [4] 费尔南·布罗代尔.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5] 胡冰川. 改革开放四十年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脉络与发展 [J]. 江淮论坛, 2019 (2): 29-36.
- [6] CARTER C A, LOYNS R M A, BERWALD D. Domestic costs of statutory marketing authorities: the case of the Canadian Wheat Board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8, 80 (2): 313-324.
- [7] FULTON M, GIANNAKAS K.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a mixed oligopoly: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nd investor-owned firms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1, 83 (5): 1258-1265.
- [8] 朱满德, 邓喻方. 农产品主要出口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调整动向及其启示?: 基于美国、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四国比较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9, 40 (5): 764-773.
- [9] 胡冰川. 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研究 [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0 (5): 253-256.

# 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动力机制与引导策略

◆ 全世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可持续消费正在成为各国制定消费战略和公共政策的一个聚焦点，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然选择。本文首先从两个维度构建了一个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不同学科对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动力机制的解释及其对应的引导策略，说明了消费者对可持续食品标签偏好的研究进展，并介绍了选择实验方法在食品需求分析中的应用。从研究趋势上看，在探讨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多重动机、理解消费者的决策机制和制定引导策略时，不同学科的融合将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在复杂信息系统中研究多重动机的冲突或关联、多元食品标签的价值互补或替代、多种引导策略的协同效果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而选择实验方法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关键词：**可持续消费；消费者行为；行为经济学；食品标签；选择实验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0.06.004

## 1 引言

现行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在“自由选择”和“消费主权”的信念之上，消费主义文化的蔓延导致了资源和能源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被过度消费。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过度消费并不能提高个人的幸福感和人类福祉，反而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破坏<sup>[1]</sup>。在所有消费领域中，食品消费在人们的日常消费结构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根据 Wansink 和 Sobal<sup>[2]</sup> 的调查，消费者平均每天会做出超过 200 个与食品有关的决策。然而，食品消费对环境的影响在所有消费领域中最强的<sup>[3]</sup>。食品消费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贡献了 20%，与食品相关的物流体系则进一步贡献了 14%<sup>[4]</sup>。过量的食品消费是导致水资源恶化、土壤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且，由

过量的食品消费引起的超重与肥胖也对个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一系列的医学研究证实了超重和肥胖人群患糖尿病、多种心脏疾病、中风、心血管疾病、哮喘、不育症和部分癌症的风险都显著高于普通人群<sup>[5]</sup>。超重和肥胖不仅会直接引起医疗支出的上升，还会因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产生间接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会因社会歧视导致工作机会减少和生活质量下降<sup>[6]</sup>。

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资源和能源密集型的食品消费模式被公认为严重地不可持续。

收稿日期：2020-0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城乡居民的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18CJY01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食品安全消费者行为与风险交流策略研究”（71633005）。

作者简介：全世文（1987—）男，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正因为如此,自从1994年奥斯陆峰会提出“可持续消费”的概念以来,可持续的食品消费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其理念和模式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并成为主流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资源与能源的紧约束条件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沿袭发达国家的食品消费模式,可持续的食品消费模式是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sup>[7]</sup>。

中国从2006年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2011年中国碳排放量达到90.20亿t<sup>①</sup>。其中,农业碳排放达到9.64亿t,同样位居世界第一<sup>②</sup>,肉制品和乳制品的生产是农业碳排放最主要的来源,动物肠道发酵、粪肥残留和粪肥管理合计为农业碳排放量贡献了72%<sup>③</sup>。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超重(BMI>25)的比率从2002年的14.7%上升到2014年的34.4%,政府公共健康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02年的4.8%持续增长到2013年的5.6%<sup>④</sup>。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食品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使中国对主要农产品,尤其是肉制品和乳制品的需求量持续增加,这也意味着食品消费将带来更大的环境压力和公共健康问题。推动可持续的食品消费将成为缓解和改善一系列环境问题和健康问题的关键所在。

由于食品可持续消费在生态环境、公共健康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正外部性,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来推动食品消费行为向可持续模式进行转变。Reisch等<sup>[9]</sup>将传统的政策工具分为3类:信息类工具(例如,宣传教育和建立食品标签制度)、市场类工具(例如,对不健康食品征收额外的消费税和对可持续的食品生产进行补贴)和管制类工具(例如,制定食品生产的标准和限制不健康食品的广告)。此外,其他的政策工具还包括对健康食品的公共采购计划以及来自行为经济学的“助推”(nudge)性策略等。政策制定者在选择政策工具时需要权衡管制强度和消费主权。强干预政策虽然可能会更加“立竿见影”地实现政策目标,但也会因为更高的政策成本和消费者自由选择权的丧失而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因此,以食品标签制度为代表的信息类工具应用最为广泛<sup>[9]</sup>。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对近年来围绕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研究进展进行跟踪和梳理,重点说明不同学科对可持续消费行为动力机制的解释,从而为制定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引导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并明确后续研究的方向。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通过一个经验性的框架对食品可持续消费领域的研究进行归纳,第三节说明消费者发生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动力机制,第四节介绍行为经济学在食品可持续消费领域的应用研究进展,第五节梳理消费者对可持续食品标签的偏好与需求,第六节介绍选择实验方法在食品需求分析中的应用研究进展,第七节进行总结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 2 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研究框架

消费过程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个系统包含了投资、生产、贸易、分销、消费和废弃物排放,消费环节对经济、制度、文化和权力结构都会产生影响<sup>[1,10]</sup>。可持续消费意味着整个系统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从传统的消费主义文化转变为一种尊重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文化<sup>[11]</sup>,而引导消费者的行为发生变化既是政策目标,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目标。图1描绘了食品可持续消费领域的一个研究框架。

在图1所示的框架中,第一个研究维度是消费者行为分析中“动机→偏好→行为”的逻辑顺序。其中,研究消费者发生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动力机制处于基础地位。在微观层面上对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是制定相应的食品标签策略和引导食品消费行为转变的基础。只有把握了不同动机的强弱和关系,才能据此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并将其引入政策工具的运用。消费者行为分析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为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动机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解释。这些解释不仅包括了消费者对各种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的理性价值认知,还包括了消费者非理性的思维和决策模式。对动力机制的把握是制定可持续消费行为引导策略的前提条件。

①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PC>。

② 通过计算可知,2011年农业碳排放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比例为10.69%,高于同年农业增加值对国内生产总值9.5%的贡献率(详见《中国统计年鉴》)。

③ 农业碳排放的相关数据来源于FAO: [http://faostat3.fao.org/browse/G1/\\* /E](http://faostat3.fao.org/browse/G1/* /E)。

④ 数据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库: <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country.country-CH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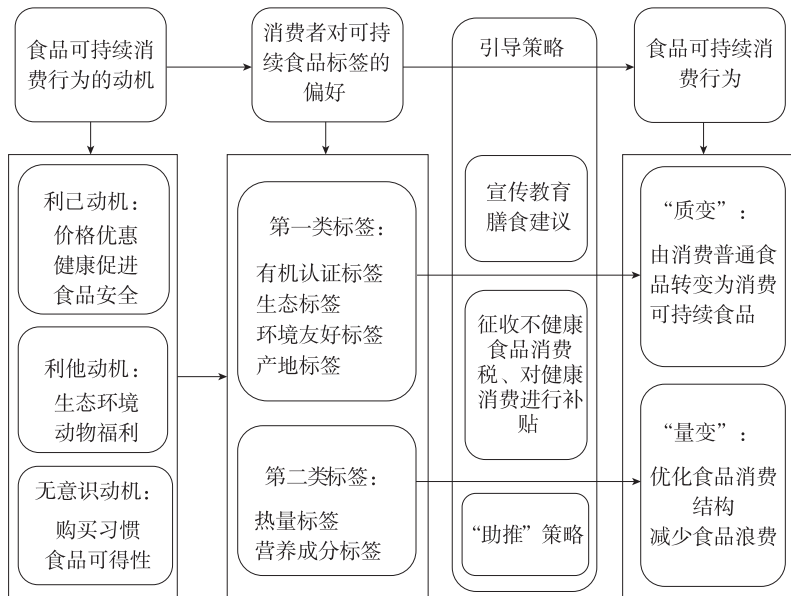


图 1 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一个研究框架

如图 1 所示，在一系列的引导策略中，建立食品标签制度不仅是一种直接的信息类政策工具，而且是其其他很多引导策略的实施载体，例如，政府对有机食品的消费者或生产者进行补贴、向消费者宣传推广环境友好型食品等。“可持续食品标签”反映了消费者发生可持续消费行为的一部分利己动机或利他动机，因此，消费者满足不同动机的过程表现为对相应的食品标签产生偏好，进而购买具有相应标签的食品。也就是说，推动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引导消费者对某些标签食品的购买。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在食品可持续消费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分析消费者对各种“可持续食品标签”（例如，有机认证标签、生态标签、产地标签等）的认知和需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消费者对特定标签食品的购买行为，或者评价不同引导策略的实施效果。

第二个研究维度是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转变模式。第一种转变模式可以描述为“质变”，即消费者由消费普通食品转变为消费“可持续食品”（sustainable food），例如，有机食品、生态食品和短链食品（本地食品和当季食品）。第二种转变模式则可以描述为“量变”，即消费者在适度消费的原则下优化食品的消费结构和减少食品浪费，这种消费模式被 Reisch<sup>[9]</sup>称为“可持续膳食”（sustainable diet），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控制并减少动物制品（肉制品和乳制品）的消费量<sup>①</sup>。

如图 1 所示，两种不同的转变模式分别对应两类可持续食品标签。两类食品标签的差异在于其价值内涵有所不同。其中，第一类标签（包括有机认证标签、生态标签等）的价值来源于食品内在属性的提升，例如，有机认证标签意味着食品的安全水平更高，生产过程更加环保。第二类标签（包括营养成分标签和热量标签）则仅具有显示食品内在属性的信息价值，而食品的内在属性本身并没有变化。这种差异意味着两种可持续消费行为的转变模式具有不同的福利测度方法<sup>[12]</sup>。标准价值评估理论中的“补偿变差”和“等价变差”都可以被用来分析消费者对第一类食品标签的边际需求，从而对消费行为的“质变”做出福利变化的评估，但这种方法对第二类标签并不适用。由第二类食品标签提供引起的福利变化表现为食品消费量的变化而非食品内在属性的变化，即新信息的提供会通过改变消费者对食品边际价值的认知来改变食品最优消费量<sup>②</sup>。

① 不同膳食结构的碳足迹具有明显差异，其中，消费肉制品和乳制品的碳排放量显著高于谷物、蔬菜和水果，例如，消费 1kg 的牛肉 CO<sub>2</sub> 排放量为 27kg，同质量的奶酪为 13.5kg，猪肉为 12.1kg，而土豆和大米仅为 2.9kg 和 2.7kg（Hamerschlag, Venkat, 2011）。

② 事实上，第一类可持续食品标签也面临着消费量变化的可能性，例如，消费者由购买普通食品转而购买有机食品以后，可能会因为固定的食品预算而减少购买量。但绝大多数现有研究并没有考虑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食品支出在消费者的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且食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所以可持续食品的溢价不足以明显降低消费量。

### 3 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动力机制

在可持续消费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消费者对节能环保产品（例如，新能源汽车、节能灯等）的购买行为。给定现有的生产技术，大多数节能环保产品对消费者而言是缺乏经济效率的，因此，消费者一般不会自发的购买这些产品。也就是说，内在的动力机制不足以有效推动消费者行为发生改变，因此，需要施加外在的激励机制来改变消费者行为<sup>[13]</sup>。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经济激励通常是可持续消费行为最主要的动机<sup>[14]</sup>。由于节能环保产品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上存在正外部性，因此，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消费补贴便成为了政府推动此类可持续消费行为的核心政策工具。不同的消费者对节能环保外部性的价值认知有所差异，补偿标准越高，经济激励效果越好，购买节能环保产品的消费者就越多。

利他主义的环境保护动机是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产品的另一个主要动机。事实上，在有限的财政补贴约束下，政府对节能环保产品的补贴标准通常不足以弥补其与普通产品的价差；也就是说，在有限的补偿下，只有环保意识较强的消费者才会改变消费决策。因此，从整体上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知是推动可持续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是宣传教育类政策工具的意义所在。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个人的价值观念、信仰、社会规范和决策情景等因素都可能唤醒个人的利他主义行动。例如，从社会规范来看，来自主要参考对象（同质消费群体）的环保消费行为会显著促进个体购买节能环保产品的行为<sup>[15]</sup>。从“信号显示”效应来看，个体希望通过消费节能环保产品来向其他消费者显示自己的环保倾向和环保意识<sup>[16]</sup>。

作为可持续消费问题的一个子领域，可持续的食品消费行为显然也可以适用上述研究成果。但食品消费异于非食品消费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食品会直接影响到人体健康。因此，食品消费由不可持续模式向可持续模式的转变过程不仅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外部价值，还有改善人体健康的内部价值，前者对应于利他主义，后者则对应于利己主义<sup>[17]</sup>。此外，基于动物福利层面上的考虑也是很多消费者购买可持续食品或减少肉制品消费的另一个动机<sup>[9]</sup>。

于是，一个直接的研究问题就是对消费者发生可持续食品消费行为的多重动力机制进行比较分析。把握可持续消费行为的主要动机是生产者制定可持续食品标签营销策略的基础，也是政策制定者选择政策工具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将消费者依据不同的动机进行聚类则可以为生产者制定市场细分策略提供重要参考。

已有很多研究在特定食品和特定消费群体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利己动机（健康促进或食品安全）和利他动机（生态环境）进行了比较<sup>[18-19]</sup>。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地区文化背景的不同，这两种动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者中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Cerjak 等<sup>[20]</sup>的研究发现，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主要动机是基于健康价值的考虑，其次才是环境保护。而 Bougherara 和 Combris<sup>[18]</sup>通过开展随机实验发现法国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环保与社会价值的关心才是其购买有机食品的主要动机。Thøgersen<sup>[21]</sup>通过对欧洲 4 国（丹麦、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消费者调查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即利他价值是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主要动机，同时，该研究还证实了自我理性认知等一系列心理因素会导致消费者过高地陈述利己动机。Thøgersen 等<sup>[19]</sup>的研究发现，中国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积极态度主要来源于消费者对有机食品健康价值的关心，中国消费者认为认证和控制体系使有机食品相对于普通食品更加安全，从而有利于孩子和家人的健康。目前，虽然国内研究对有机食品的认知和购买行为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但尚未见到国内研究对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多重动机进行量化的比较分析。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不同动力机制之间的关系。最近的研究表明，经济激励动机与利他主义动机可能存在矛盾。首先，经济补偿政策会将消费者的购买节能环保产品时的“社会规范决策”或“伦理决策”直接转变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决策”，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小额度的补贴不仅不能促进，反而会抑制可持续消费<sup>[22]</sup>。其次，经济激励手段会妨碍消费者自我暗示为一个环保主义者，也会降低消费者说服自我购买节能环保产品的动力<sup>[14]</sup>。另外，对绿色产品的消费补偿策略还会显著降低“信号显示”效应，从而阻碍一部分消费者出于环保声誉考虑的



购买行为<sup>[16]</sup>。

就可持续食品而言,利他主义的环境保护动机和利己主义的健康动机之间也可能存在关联。虽然这两种动机来自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很多可持续食品标签同时向消费者传达了“更环保”和“更健康”的信息,当消费者可以通过一种食品标签同时满足两种需求时,环保动机和健康动机就可能产生交互关系。例如,同时具有环保动机和健康动机的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有机食品来降低发生可持续消费行为的交易成本(包括认知成本和搜寻成本等),这就意味着两种动机在客观上形成了互补效果。对多重动机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是对可持续食品标签进行价值定位的基础,而价值定位将直接影响食品标签的营销策略和宣传策略。

#### 4 行为经济学在可持续消费领域的应用

在理性行为人假设基础上的效用最大化原则是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分析消费者行为时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选择了可持续的消费模式,那么,一定是因为这种消费模式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高于传统的消费模式。当可持续的食品以更加环保、更加健康、更加照顾动物福利和更高的价格等特征出现时,理性决策的原则意味着消费者需要根据自身消费动机的强弱认真地在食品的特征之间进行权衡。随着行为经济学对认知心理学的引入,这个简单的决策框架在近年来不断地受到了挑战<sup>[23]</sup>。例如,消费者可能会表现出有限理性,因而背离效用最大化原则下的“最优选择”。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为政策制定者同时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行为经济学家在解释消费者行为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其一是“选择框架”(choice architecture),即消费者所面临的决策情景的设计方式,包括选项的数量和排列顺序、选项的定义与描述方法、决策的环境与规则等<sup>[24]</sup>。标准的经济理论认为消费者偏好不会受到情景设定的影响,但一系列研究都证实了消费者偏好并不是提前给定的,选择框架的设计会对消费者决策的过程和结果都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二个概念是“自由专制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即在保留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利的同时引导其行为朝着预定的政策目标转变<sup>[25]</sup>。自由专制主义主张“助推”(nudge)性的政策工具,即通过低

成本的、允许自由选择的、温和的政策来设计选择框架,进而引导消费行为转变,这些政策工具包括“默认规则”(default rules)的设计、信息简化、凸显信息设计等<sup>[24-26]</sup>。

默认规则会显著地影响消费者行为,首先是因为惰性和拖延心理导致消费者不愿意主动改变默认的选项,其次是因为禀赋效应的存在令消费者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另外,损失厌恶导致消费者不愿意背离默认选项所在的初始参照点。在食品消费领域的许多研究通过实验方法证实了这一结论。例如,Just和Wansink<sup>[27]</sup>发现,将健康食品放置在更便利和更易获得的“默认”位置可以显著降低消费者对不健康食品的消费量。运用默认选项将食品提供方式进行微小的调整就会引起消费者行为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促进公共健康<sup>[28-29]</sup>。尽管助推性的干预已经被很多政策制定者所采用,但其效果在不同的被试者或不同的应用背景中具有明显差异<sup>[30-31]</sup>,而现有研究对助推性策略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尚缺乏足够的讨论。而且,自由专制主义并非完全保留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利,政策设计者依据自身规划的福利目标设计的选择框架并未考虑消费者的建议,因此,这种来自逻辑外推的政策有效性是否确实提高了社会福利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证明<sup>[32]</sup>。

行为经济学接受的另一个事实是消费者具有有限的认知能力。在有限的认知能力的约束下,消费者难以实现完全理性的决策,而是会根据“启发式”(heuristics)选择某种“捷径”来简化决策过程。来自认知心理学的“二元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揭示了消费者的两种不同的决策机制:一种决策机制表现为通过深思熟虑和有意识地增加认知资源投入来实现个体的特定意愿,另一种决策机制则表现为无意识地减少认知资源投入,从而自发地完成选择<sup>[33-34]</sup>。消费者采取哪种决策机制取决于其消费动机的强度、消费者的认知能力及其所能投入的认知资源、决策情景的信息设计和信息负荷等因素。

由于“可持续性”对多数消费者而言并不是食品最重要的属性,所以仅在第一种决策机制中,消费者才有可能考虑可持续消费<sup>[35]</sup>。因此,设计引导策略的直接目标就是将消费者由第二种决策机制转变为第一种决策机制。简化信息和设计凸显信息的

策略就可以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从而可以被用来促进食品的可持续消费行为。例如,图像形式的提示信息较文字形式更加有效<sup>①</sup>;直接提示结果的具体信息较笼统意义上的抽象信息更加有效,这也可以解释以“适度消费”为主题的引导策略不如以“健康影响”为主题(例如,直接标注食品的热量)的引导策略更加有效<sup>[36]</sup>。

在第二种决策机制中,消费者采取的一种常用策略是形成消费习惯。习惯性的食品消费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消费习惯具有重复性、自发性和情景触发性的特征:重复性意味着消费习惯会通过不断的积累对个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长期影响;自发性意味着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不必投入过多思考,认知压力可以得到大幅下降;情景触发性意味着购买行为可以由特定的购物情景或提示线索所触发,而非完全取决于消费者的态度和意愿<sup>[37]</sup>。改变消费者的固有消费习惯非常困难,因此,如果食品的可持续性未被消费者优先考虑,试图直接引导消费者由传统消费模式转向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策略通常难以见效。Verplanken 等<sup>[38]</sup>提出了“习惯非连续假说”,即决策情景的变化会使消费习惯出现转折,旧的消费习惯可能无法适用于新的消费环境,这就为引导策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许多后续研究都证实了这一假说,例如,Thøgersen<sup>[39]</sup>通过向居民免费发放公共交通卡的措施来改变居民的出行方式,实验发现该措施的效果在近期搬迁居所或更换工作地点的居民中明显优于普通居民。这一假说同样可以被用于设计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引导策略,例如,可以考虑将新生儿家庭或近期患病的消费者群体列为重点的引导对象,向其宣传食品可持续消费的健康价值。

## 5 消费者对可持续食品标签的偏好

食品标签会显著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因而在食品营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政府也可以通过食品标签制度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食品标签首先具有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功能<sup>[12,40]</sup>。Nelson<sup>[41]</sup>将食品属性分为3类:搜寻属性(消费者在购买前可以观测到的属性,如价格和颜色)、经验属性(消费者在购买后的消费体验过程中可以发现的属性,如味道和口感)和信用属

性(消费者在购买前和购买后都无法观测到的属性,如环境影响、营养价值和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食品的信用属性上,“可持续食品标签”的作用就在于将信用属性转化为搜寻属性,从而缓解消费者的信息劣势<sup>[42]</sup>。食品标签的第二个功能是纠正消费的外部性。个体对不健康食品的消费决策会对社会福利造成影响,例如,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增加公共健康的财政支出等。由于市场类和管制类的政策工具会减少消费者的选择权从而可能引起更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所以政府更加青睐于通过引导性或强制性的食品标签制度来改变消费者行为,从而纠正消费的外部性。

当食品标签为“私人物品”时,生产者会根据消费者行为变化的预期来判断标签信息带来的收益,从而决定是否主动地进行标识,此类标签通常是为了说明食品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或属性。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当食品标签在食品行业中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时,政府或第三方机构会制定标准或规范以供生产者申请认证,从而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提高食品标签的经济效率,此类标签包括“环境友好食品”和“有机食品”等。而当食品标签反映了某种负面信息时,生产者既不会主动标识,也不会申请认证,此时,政府一般会强制性地要求生产者进行标识,这类标签包括热量和脂肪含量等。如图1所示,可持续食品标签主要属于上述后两种情况。

评价可持续食品标签策略是否有效的基本方法是成本收益分析。其中,食品标签策略的“收益”取决于消费者对食品标签的认知和信任以及在此基础上购买行为。目前,国内外均已有大量的研究以某一个可持续食品标签为对象分析消费者对食品标签的认知、信任度、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其中,被关注最多的标签包括有机认证标签<sup>[43-44]</sup>、生态标签<sup>[45-46]</sup>和产地标签<sup>[47-48]</sup>。虽然大多数食品属于“市场产品”,但食品标签作为食品的一个特征(搜寻属性)则属于“无市场产品”;而且,食品标签所表达的健康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和动物福利价值等也属于“无市场产品”。也就是说,研究者通常难以根据

<sup>①</sup> 该策略的一个经典应用就是在香烟外包装上添加“吸烟有害健康”的相关警示图片。

真实市场中的食品购买行为或销售数据（即显示偏好数据）来获取消费者对食品标签的需求曲线，而获得需求曲线则是测算食品标签“收益”（即福利测度）的前提条件。为此，学术界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是通过陈述偏好数据来估算消费者对食品标签的边际支付意愿，据此模拟出需求曲线并测度由食品标签提供引起的福利变化。大量研究采用不同的陈述偏好方法分析了消费者对可持续食品标签的支付意愿。近年来，选择实验方法快速发展并被研究者广泛应用于食品需求分析，本文将在下一节简单介绍选择实验的应用研究进展。

目前，食品外包装的标签上所包含的信息类别与信息内容都有越来越丰富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如图 1 所示，与可持续消费行为相关的食品标签包括有机认证标签、各种生态标签或环境友好标签、产地标签和各种营养标签等。这就意味着以单一标签为对象来讨论消费者的认知、行为和支付意愿的研究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随着对认知心理学的引入，经济学家普遍接受了消费者具有有限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资源，不可能在每次消费决策中都按照完全理性的原则考察所有的标签信息<sup>[49-50]</sup>。因此，对食品标签策略的有效评价需要考虑标签提供的信息环境和消费者的决策机制。另一方面，不同的食品标签可能反映了相同或相关的食品信用属性（更加环保、更加健康等），这就会引发价值评估中的“嵌入效应”（embedding effect）：将某个食品标签单独进行评价和作为一组标签中的构成元素之一进行评价所得到的结果会有所差异。这是因为消费者发生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动机在多种食品标签中出现了价值重叠或价值互补。

探索不同食品标签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消费者在多元食品标签提供背景下的决策机制是有效评价食品标签策略的一个前提条件，也可以为多元标签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近年来，已经有部分研究开始关注不同食品标签之间的关系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例如，Gao 和 Schroeder<sup>[42]</sup>在分析美国消费者对牛肉的偏好时，发现“美国产地认证”标签对“嫩牛肉保证”标签具有替代作用，而对“精牛肉保证”标签则具有互补作用。Onozaka 和 Mcfadden<sup>[51]</sup>以苹果和番茄为对象分析了一系列可持续食品标签之间的关系，其中，有机认证标签和进口食

品标签之间存在互补效果，公平贸易标签和碳足迹标签、进口食品标签之间也存在互补效果，碳足迹标签和进口食品标签则存在替代效果。Meas 等<sup>[52]</sup>以果酱为调查对象，验证了相似的结论：有机认证标签和本地食品标签之间存在显著的价值重叠，即替代效果。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吴林海等<sup>[53]</sup>以猪肉为研究对象，发现可追溯信息属性与本地属性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与外地产属性则存在互补关系。尹世久等<sup>[54]</sup>以番茄为研究对象，发现可追溯标签与食品安全认证标签（有机认证标签、绿色食品标签和无公害食品标签）和品牌标签都存在互补关系，而食品安全认证标签和品牌标签之间则存在替代关系。

但是，现有研究对多元食品标签之间关系的探讨还仅停留在经验性的层面上，因此，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推广尚有待商榷。由于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多元食品标签之间存在相关性或交互关系的原因尚难以得到有效的解释和验证。事实上，结合现有行为经济学对消费者有限认知能力的解释，上述研究验证的替代关系或互补关系并不能严谨地说明食品标签之间确实存在价值互补或价值替代。如果特定的食品标签之间被验证出存在稳健的价值互补或价值替代关系，那么，生产者应该据此设计“绑定”一组标签的策略或单独的标签策略。但因为消费者的认知能力有限，新提供的标签会导致每个标签的价值被“稀释”，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对食品标签存在递减的边际认知价值<sup>[55]</sup>。那么，生产者制定新的标签策略时就要谨慎地考察所有已存在的标签信息。

## 6 选择实验在食品需求分析中的应用

在分析消费者对食品属性（包括食品标签）的偏好时，由于显示偏好数据无法观测，研究者需要通过陈述偏好方法来分析消费者需求。在早期的研究中，条件价值评估（contingent valuation）方法被广泛用来评价消费者对某种特定食品或食品属性的支付意愿<sup>[56-58]</sup>。相比之下，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选择实验方法才逐渐被经济学家采用。近十年来，随着实证模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计算机运算速度的大幅提高，选择实验方法在食品需求领域中的应用研究快速增长，被研究者广泛用来分析消费者对各



种可持续食品标签的偏好。

在选择实验的一个选择情景中,被试者需要在—组虚拟产品或选项之间做出选择,该过程被假设为满足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每个虚拟产品均由多个产品属性进行定义,属性取值的差异决定了产品差异。—个完整的选择实验通常要求被试者在多个选择情景中连续做出多次决策。依据被试者的决策信息,研究者可以分析消费者对各个产品属性的偏好,并可以进一步评估产品属性的边际价值,据此为公共政策或营销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与条件价值评估方法相比,选择实验的—个核心优势是其更加符合真实市场情景的高信息负荷<sup>[59]</sup>。高信息负荷首先表现在多属性的实验设计可以使研究者同时对多个产品属性进行偏好分析,借此把握消费者对多属性的偏好结构。其次,研究者可以通过多选择情景的实验设计来获取面板数据,从而更加准确地分析消费者偏好。选择实验令被试者通过对比属性从而在产品之间做出选择的决策模式被认为更加逼真地模拟了真实市场情景,而优于条件价值评估方法要求被试者直接在评估目标和金钱价值之间进行权衡的决策模式<sup>[60]</sup>。

在食品需求领域,研究者采用选择实验方法的—个重要目标就是引出消费者对—系列食品属性或可持续食品标签的偏好或支付意愿,包括有机认证、产地信息、可追溯信息、转基因、质量安全保证、动物福利等<sup>[61]</sup>。基于高信息负荷的优势,选择实验不仅能够满足研究者单独分析某个食品属性的需要,还能够对多个属性的偏好进行比较并把握其相关性。如前文所述,对多元食品标签之间关系的探讨正在成为食品需求分析领域的—个重要研究方向,而选择实验则是研究这—问题的首选方法。具体而言,在选择试验中讨论多个食品属性的相关性有两种实验设计思路:第—种思路是设计—个附加交互项的选择实验,从而通过交互项系数的估计值来判断食品属性或食品标签之间的关系:系数为正意味着互补关系,系数为负意味着替代关系<sup>[51-53]</sup>;第—种思路是设计多组包含不同食品属性的选择实验,通过组间或组内对比来判断食品标签之间的关系:新标签的提供导致原标签的边际价值提高意味着互补关系,反之意味着替代关系<sup>[42,62]</sup>。

从实验操作上来看,第—种设计思路需要提前

根据实证模型中引入的交叉项来优化实验设计效率。尽管产品属性的二维交叉效应仅能解释5%~15%的行为变差,但引入交叉项的优化设计方案与仅考虑主效应的设计方案则存在差别,实验设计时忽略了交叉项将会引起设计效率的降低<sup>[63-64]</sup>。例如,Meas等<sup>[52]</sup>就没有采纳通用的正交设计方案,而是采用了包含交叉项的全因子设计方案,并通过随机抽样方法来保证实验设计效率。第—种设计思路虽然对每一组样本都可以设计—个仅考虑主效应的实验,但在组间比较时却需要控制不同实验组信息负荷的差异。因为信息负荷的差异会导致消费者认知差异和信息处理策略的差异,这可能是导致实验结果存在组间差异的另—原因。

选择实验的高信息负荷在为研究者提供更大的分析潜力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实验结果效度的问题,而方法效度问题则是陈述偏好方法在应用研究中的核心问题<sup>[59]</sup>。许多采用Monte Carlo模拟数据的研究证实了实验设计维度(包括:属性的数量、属性水平的数量、属性的定义域、产品选项的数量等)的定义方式会显著影响选择实验的估计结果<sup>[65-66]</sup>。而且,由于认知能力有限,被试者在决策过程中可能会根据“启发式”采取—系列的信息处理策略用来简化决策过程,而这些策略通常会违背理性决策假设,从而导致估计偏差<sup>[67-69]</sup>。因此,为了有效和稳健地识别消费者对多个食品属性的偏好结构,研究者必须要在实验设计和实证过程中谨慎地处理由实验设计维度的信息定义和消费者信息处理策略引起的偏差。

目前,国内农业经济学领域和环境经济学领域采用选择实验方法的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应用研究,尚未见研究关注方法本身的效度问题。从国际上的研究来看,验证陈述偏好方法在应用研究中存在偏差以及提供改进方法效度的方案是—项重要的研究内容,而食品需求分析在应用价值以外还为方法效度的改进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平台。正如全世文<sup>[59]</sup>所述,虽然现有研究尚未就选择实验方法的效度达成普遍—致的共识,但现有的很多研究结论已经被应用研究者广泛采用。例如,为了降低由多个选择情景引起的“排序效应”,实验设计者会向被试者提前披露选择情景的数量,并将选择情景进行随机排序。又例如,为了降低“假想偏差”,现有很多研究都会



采用一个附带有结果性承诺的实验设计方案,即要求被试者为其决策发生真实的支付行为。国内研究在应用选择实验方法时应当加强对这种实验设计规范的重视。

## 7 总结与展望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可持续消费正在成为各国制定消费战略和公共政策的聚焦点。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的推进,食品消费结构将会进一步升级,传统的食品消费模式必将带来更严重的生态环境压力和公共健康问题。可持续的食品消费模式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引导可持续的食品消费行为将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策着眼点。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来看,在未来的15~20年后,随着中国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将会转移到以市场、行业和企业为重心的食品经济与管理<sup>[70]</sup>,食品可持续消费必然成为跨农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领域中越来越重要的研究内容。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提出了一个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研究框架,并重点阐述了其动力机制和对应的引导策略。结合本文的讨论,对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研究应当重视以下几个研究趋势。

第一,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的跨学科融合。可持续消费一直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但随着不同学科对消费者行为的理解不断深入和交融,传统经济学在理性行为人假设基础上分析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食品可持续消费典型地兼具了健康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消费者决策过程则兼具了理性与非理性机制;不同学科在此基础上对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动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引导策略。标准微观经济理论在利己消费动机的基础上引出通过征税或补贴的方式来纠正外部性,达到引导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目标。环境心理学聚焦于如何通过引导人们的环境价值观、态度和认知来激发环境利他主义行动。行为经济学则关注如何利用消费者的非理性,通过改变选择框架和“助推”性策略来引导可持续消费行为。虽然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存在差异,但是,通过融合多个学科的理论来探讨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多重动力机制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趋势,其关键则是

对消费者价值观和消费者决策机制的理解和把握。

第二,在复杂信息系统中研究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传统的可持续消费研究通常仅关注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一种消费动机、一种可持续标签或者一种引导策略。随着消费者接收越来越大量的消费信息,这种将研究对象假设为独立信息的研究越来越不能满足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的需要。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研究对象之间本身存在相关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消费者的认知能力有限,导致其对待一种研究对象的信息处理策略和同时对待多种研究对象时存在差异。因此,将消费者置于独立信息情景中的研究结果很可能是缺乏效度的。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在复杂信息系统或情景中来开展可持续消费领域的研究:分析多重动机之间的冲突或关联、验证多元食品标签之间的互补或替代关系、检验多种引导策略之间的协同效果等。与此同时,这种情景设定模式也为研究消费者在复杂信息条件下的决策机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第三,以选择实验为代表的新方法的广泛应用。经济学家在采用传统的陈述偏好方法对消费者进行调查时通常需要对问题情景进行抽象和简化,但消费者面临的现实市场情景则是一个复杂信息系统。选择实验方法在近年来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传统方法相比选择实验可以更好地模拟消费者在真实市场情景中的决策。选择实验代表了允许复杂信息系统设计的新方法,其高信息负荷的实验设计为开展多个目标对象(多重消费动机、多元食品标签、多种引导策略)的应用研究提供了现实条件。国内农业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对选择实验的应用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在包括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诸多研究领域,采用选择实验方法的应用研究将越来越多。但是,高信息负荷的实验设计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实验结果效度的问题。加强实验设计的规范和检验实验结果的效度应当成为今后国内研究应用选择实验方法时的重点。

## 参考文献

- [1] LOREK S, VERGRAGT P J.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s a systemic challenge: inter-and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research questions [M] // REISCH L A, THØGERSEN J.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 consump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5.
- [2] WANSINK B, SOBAL J. Mindless eating: the 200 daily food decisions we overlook [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7, 39 (1): 106-123.
- [3] VETÖNÉ MÓZNER Z. Sustainability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food consumption clusters. A case study for Hunga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2014, 38 (5): 529-539.
- [4] HAINES A, MCMICHAEL A J, SMITH K R, et al. Public health benefits of strategies to reduce greenhouse-gas emissions: overview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J]. *The Lancet*, 2009, 374 (9707): 2104-2114.
- [5] GWOZDZ W. Obesity, sustainability and public health [M].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2015.
- [6] PUHL R M, HEUER C A. The stigma of obesity: a review and update [J]. *Obesity (Silver Spring, Md.)*, 2009, 17 (5): 941-964.
- [7] 田圣炳. 可持续消费研究评述[J]. *经济学动态*, 2006 (11): 80-84.
- [8] 张建平, 季剑军, 晋晶. 中国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战略选择与政策建议[J]. *宏观经济研究*, 2015 (8): 65-75.
- [9] REISCH L, EBERLE U, LOREK S. Sustainable food consumption: an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policies [J]. *Sustainability Science Practice & Policy*, 2013, 9 (2): 7-25.
- [10] VERGRAGT P, AKENJI L, DEWICK P. Sustainable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livelihoods: global and regional research perspectives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4, 63 (15): 1-12.
- [11] BROWN H S, VERGREGT P J. From consumerism to wellbeing: toward a cultural transition?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6, 132 (20): 308-317.
- [12] ROE B E, TEISL M F. The economics of labeling: an overview of issues for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J]. *Agricultural & Resource Economics Review*, 1998, 27 (2): 140-150.
- [13] LEHMAN P K, GELLER E S. Behavior analysi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complishments and potential for more [J]. *Behavior and Social Issues*, 2004, 13 (1): 13-32.
- [14] BOLDERDIJK J W, STEG L. Promoting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the risks of using financial incentives [M] // REISCH L A, THØGERSEN J.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5.
- [15] SAWITRI D R, HADIYANTO H, HADI S P.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from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erspective [J]. *Procedia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5, 23: 27-33.
- [16] GRISKEVICIUS V, TYBUR J M, BRAM V D B. Going green to be seen: status, reputation, and conspicuous conservation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0, 98 (3): 392-404.
- [17] WELSCH H, KUHLLING J. Are pro-environmental consumption choices utility-maximizing? Evidence from subjective well-being data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1, 72 (12): 75-87.
- [18] BOUGHERARA D, COMBRIS P. Eco-labelled food products: what are consumers paying for? [J].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9, 36 (3): 321-341.
- [19] THØGERSEN J, BARCELLOS M D D, PERIN M G, et al. Consumer buying motives and attitudes towards organic food in two emerging markets China and Brazil [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2015, 32 (3/4): 389-413.
- [20] CERJAK M, MESI E, KOPI M, et al. What motivates consumers to buy organic food: comparison of croatia, bosnia herzegovina, and slovenia [J]. *Journal of Food Products Marketing*, 2010, 16 (3): 278-292.
- [21] THØGERSEN J. Green shopping: for selfish reasons or the common good?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1, 55 (8): 1052-1076.
- [22] DOGAN E, BOLDERDIJK J W, STEG L. Making small numbers count: environmental and financial feedback in promoting eco-driving behaviours [J].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2014, 37 (3): 413-422.
- [23] LEBOEUF R A, SHAFIR E. *Decision Making [M] // HOLYOAK K J, MORRISON R G.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inking and reason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9-81.
- [24] THALER R H, SUNSTEIN C R.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5] SUNSTEIN C R, THALER R H.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is not an oxymoron [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03, 70 (4): 1159-1202.
- [26] ALLCOTT H. Social norms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95 (9/10): 1082-1095.
- [27] JUST D R, WANSINK B. Smarter lunchrooms: us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improve meal selection [J]. *Choices the Magazine of Food Farm & Resource Issues*, 2009, 24 (3): 1-7.
- [28] JUST D R, MANCINO L, WANSINK B. Could behavioral economics help improve diet quality for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participants?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7, 43: 36.

- [29] MCCLUSKEY J J, MITTELHAMMER R C, ASISEH F. From default to choice: adding healthy options to kids' menus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2, 94 (2): 338-343.
- [30] BESHEARS J, CHOI J J, LAIBSON D, et al. The limitations of defaults [C]. Washington, D. C.: NBER, 2010.
- [31] QUIGLEY M. Nudging for health: on public policy and designing choice architecture [J]. *Medical Law Review*, 2013 (4): 4.
- [32] LUSK J L. Are you smart enough to know what to eat? A critique of behavioural economics as justification for regulation [J].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4, 41 (3): 355-373.
- [33] CHAIKEN S, TROPE Y. Dual-process theor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9.
- [34] STRACK F, DEUTSCH R. Reflective and impulsive determinants of social behavior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4, 8 (3): 220-47.
- [35] VERPLANKEN B, ROY D. Empowering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lifestyles: testing the habit discontinuity hypothesis in a field experiment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5, 45 (3): 127-134.
- [36] SUNSTEIN C R. Behavioural economics,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 // REISCH L A, THØGERSEN J.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5: 313-327.
- [37] VERPLANKEN B. Habit: from overt action to mental events [M] // AGNEW C R, CARLSTON D E, GRAZIANO W G, et al. Then a miracle occurs: focusing on behavior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8-88.
- [38] VERPLANKEN B, WALKER I, DAVIS A, et al. Context change and travel mode choice: combining the habit discontinuity and self-activation hypothes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8, 28 (2): 121-127.
- [39] THØGERSEN J. The importance of timing for breaking commuters' car driving habits [M] // WADE A, SOUTHERTON D. The habits of consumption. Helsinki: Helsinki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ies, 2012: 130-140.
- [40] 全世文, 曾寅初, 朱勇.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者激励失灵的原因: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解释 [J]. *经济管理*, 2015, 37 (4): 159-167.
- [41] NELSON P.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0, 78 (2): 311-329.
- [42] GAO Z, SCHROEDER T C, et al. Consume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ue attribute: the value beyond its ow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ood & Agribusiness Marketing*, 2010, 22 (1/2): 108-124.
- [43] BROOKS K, LUSK J L. Stated and revealed preferences for organic and cloned milk: combining choice experiment and scanner data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0, 92 (4): 1229-1241.
- [44] 尹世久, 徐迎军, 陈默. 消费者有机食品购买决策行为与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 (7): 136-141.
- [45] 尹世久, 许佩佩, 陈默, 等. 生态食品: 消费者的偏好选择及影响因素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 (4): 71-76.
- [46] QUAN S, ZENG Y, HUANG B, et al. Chinese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of eco-labeled fish -based on a survey to consumers in Beijing [J].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Agriculture Kyushu University*, 2014, 59 (1): 205-213.
- [47] 全世文, 曾寅初, 刘媛媛. 消费者对国内外品牌奶制品的感知风险与风险态度: 基于三聚氰胺事件后的消费者调查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1 (2): 2-15+25.
- [48] NEWMAN C L, TURRI A M, HOWLETT E, et al. Twenty years of country-of-origin food labeling research: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food marketing systems [J].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2014, 34 (4): 505-519.
- [49] LOUREIRO M L. Do consumers value nutritional labels? [J].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6, 33 (2): 249-268.
- [50] ZHU C, LOPEZ R A, LIU X. Information cost and consumer choices of healthy foods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6, 98 (1): 41-53.
- [51] ONOZAKA Y, MCFADDEN D T. Does local labeling complement or compete with other sustainable labels? A conjoint analysis of direct and joint values for fresh produce claim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1, 93 (3): 693-706.
- [52] MEAS T, HU W, BATTE M T, et al.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Consumer preference for local and organic food attribut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5, 97 (4): 1044-1071.
- [53] 吴林海, 秦沙沙, 朱淀, 等. 可追溯猪肉原产地属性与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消费者偏好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 (6): 47-62+73.

(下转第 79 页)